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

台灣個案分析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and Willingness to Fight: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Case

張鈞瑋

Chun-Wei Chang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Ma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台灣個案分析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and Willingness to Fight: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Case

本論文係 張鈞瑋 君（學號：R0932200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4 月 10 日承下列考
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鈞瑋

（簽名）

（指導教授）

張鈞瑋

蘇翊宗



謝辭



現在回顧我在碩士班的這段日子就好像一連串意想不到事件的集合，從一開始原本打算畢業就拼國考的人生軌跡中偏離，到後來轉換研究領域作為論文題目。這些時間裡，除了知識上的學習，在不斷變換的規劃中，我做出了不少以前從未想過的嘗試和摸索。雖然途中不少意外與挫折，但也處處帶給我驚喜，尤其是那些在這個過程中給予我不少幫助的人。我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張佑宗老師，在我撰寫論文過程中給予研究應該著重的方向與建議，讓我能夠順利完成論文。還要感謝趙永茂老師、林俊宏老師和安井伸介老師，在我求學的期間，持續給予我各種鼓勵和關心。還有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中心，願意給我 2 年的獎助機會進行思想研究的訓練，能有這個寶貴的經驗我十分珍惜。

再來不得不提 618 研究室的好夥伴，在我這短短的學術生涯中，可以有幸與厲害的各位相遇，相互砥礪、一起學習。也祝福各位，良亦事業有成、懿平出國深造順利、易修在學術路途順遂，兆翊、志展、芄廷也都能順利畢業。還有昀曄，我最後撰寫論文的階段，在統計與程式方面得益於你的幫助。然後也沒忘記永承學長將近一年的研究桌贊助，真的感激不盡，希望學長之後留學申請順利。謝謝讀書會的三位，你們陪我從大學到研究所度過了各種幹話日常，也要感謝方隅學長和育和學長，你們促成了我攻讀研究所，還有俊明學長，在最後一年督促我完成論文，以及那些不及一一備載卻在過程中給予過我幫助的人，我都還記得，在此一併致上真摯的道謝。最後還有一直在我身後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沒有你們，我應該無法順利完成學業。

張鈞瑋

於 辛亥路台灣大學社科院 625 研究室

2023 年 5 月



中文摘要

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台灣個案分析

所組別：政治學系（學號：R09322001） 論文頁數：73 頁

研究生：張鈞瑋 指導教授：張佑宗博士

關鍵字：民主支持、參戰意願、自我防衛決心

論文提及內容：

近年來，隨著中國軍機、軍艦繞台等軍事威懾行動頻率逐漸增加，台灣人面對可能爆發的戰爭將會如何回應，成為很重要的議題。其中探究台灣人在兩岸戰爭爆發後，究竟有沒有保家衛國、堅決抵抗的意志，一直是在該議題方面相關的主要研究主題。參與防衛國土的軍事行動，固然是抗拒與中國統一最明確且強烈的行為，因此反對統一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台灣人的參戰意願。而在過往研究統獨的問題中，長期以來學界認為與台灣社會本身政治分歧—國族認同以及政黨傾向緊密相關。除此之外，根據參戰意願的相關研究顯示，這兩個因素也被證實有影響效果。雖然在針對統獨問題的辯論裡，中國的非民主制度經常是反對和中國統一理由的重要規範性論述，然而不像政黨與國族問題一直是不少研究台灣政治題目的實證分析變項，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偏好卻鮮少有研究當作主要的討論對象。

本文以台灣人的參戰意願為例，試圖分析台灣人對於民主制度內在性、價值性的支持程度，在論及反對統一最直接的行為，即對抗中國入侵上，是否會是除了政黨、國族以外，也有明確效果的因素。藉由台灣民主基金會「2021 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2021 Taiwan Democratic Value and Governance）民意調查計畫的資料分析，實證的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人對於民主制度本身的偏好差異，在控制了國族認同與政黨傾向等因素後，確實在回答假設戰爭爆發時，會不會有意願上戰場保衛台灣的問題會方面，呈現出顯著的影響。分析顯示，在民主支持的問題中，支持程度越高，則越有可能在回答有關參戰意願的問題時，也選擇有意願上戰場，反之支持程度越低，則越有可能在有關參戰意願的問題，選擇回答不願意上戰場。這樣的結果

也意味著民主制度的存續，會是構成台灣人到底會不會選擇堅決抵抗中國威脅，甚至至是願意犧牲性命的重要考量之一。





ABSTRACT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AND WILLINGNESS TO FIGHT: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CASE

by

CHUN-WEI CHANG

May 2023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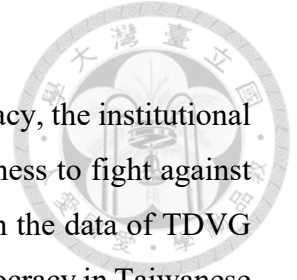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COMPARATIVE POLITICS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S: Support for democracy, Willingness to fight, Determination for self-defense

As China sends its military jets and warships around Taiwan more frequently it becomes a vital issue currently that how Taiwanese people will response if the potential war outbreaks. In terms of the relative studies on this issue, the main question is whether Taiwanese people will have an iron resolve to fight back and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themselv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war. As for Taiwanese people, the participation in military actions for territorial defense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strongest behavior against the annexation of China, therefore, the support of Taiwanese people for fight might somewhat pertain to their attitudes toward anti-reunification.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studies supposing that the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ssue in Taiwan was affected by different nation identities and party identities, which are the major cleavages in Taiwanese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s on willingness of Taiwanese people to fight also indicate that both of nation identity and party identity are the two valid factors. Unlike these two variables, despite the normativ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that political institution usually becomes the reason of anti-China unification, it's rare for decades of study to touch upon how the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influences on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Taiwa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verify that Taiwanese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out of internal values, will significantly determine their willingness to fight against Chinese invasion, except for nation identity and party ident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DVG in 2021, the positive result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preference of democracy in Taiwanese people could actually lead to the different answers to the willingness to support or not support for fight if the war broke out, after controlled the effects of nation identity and party identity.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t's more likely for people to answer they will fight against China while they prefer democracy, and it's more unlikely for people to answer they will fight against China while they don't prefer democracy. It also means that Taiwanese people will take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 democracy into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y will devote themselves to resistance to China's threat or not.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i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4
第三節 章節安排	6
第貳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理性選擇—社會人口、社會經濟因素	9
第二節 符號政治理論—國族情感與文化途徑	13
(一) 國族情感—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13
(二) 文化途徑—後物質主義與政治價值	15
第三節 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發展回顧	17
(一) 威權時期：冷戰煙硝下的對峙	17
(二) 斷交與戰略、政策的轉型	18
(三) 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與兩岸互動	21
第參章 研究設計與假設	27
第一節 研究假設	27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變項操作說明.....	29
(一) 依變項.....	29
(二) 自變項與控制變項.....	30
第三節 模型設計與預期效果.....	32
第肆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35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	35
(一) 參戰意願.....	35
(二) 民主偏好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37
(三)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40
(四)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43
(五) 性別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46
(六) 年齡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48
(七)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52
(八) 職業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表.....	55
第二節 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57
(一) 台灣宣布獨立時的參戰意願.....	57
(二) 中國武統入侵時的參戰意願.....	60
第三節 模型共線性診斷.....	64
第伍章 結論.....	6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67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68
參考文獻.....	71

表目錄



表 4-1 參戰意願（台獨）	36
表 4-2 參戰意願（武統）	36
表 4-3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38
表 4-4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39
表 4-5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41
表 4-6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42
表 4-7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44
表 4-8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46
表 4-9 性別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47
表 4-10 性別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48
表 4-11 年齡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50
表 4-12 年齡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51
表 4-13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53
表 4-14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54
表 4-15 職業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55
表 4-16 職業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56
表 4-17 宣布台獨時參戰意願之迴歸模型	59
表 4-18 中國武統時參戰意願之迴歸模型	62

表 4-19 變異數膨脹因子分析 66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匈牙利詩人 Petőfi Sándor



第壹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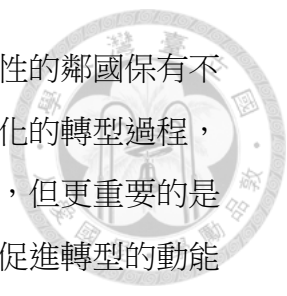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2022年在總統府舉行的中華民國110年國慶演講中，在關涉兩岸關係和國際局勢的內容中，蔡英文總統提出了「四個堅持」的主張：（一）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二）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三）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四）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就這份文稿內容的分析來看，以一個傳統上被視為是彰顯國家主權的重大政治儀式場景來說，國慶文告後面三點的聲明皆是屬於宣告對於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堅持在此被置於所有堅持的首位。同樣的論述亦出現在國慶日前一天10月9日，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針對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發表贊同台灣劃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時的回應，「台灣賣的產品很多，但我們的自由和民主是不賣的。」這兩件事情都凸顯了台灣的決策團隊在應對對外事務上，強調自身民主制度的特徵本身，在政策方針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這對於一個始終有著外部威脅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不尋常的一件事，畢竟就一般性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角度來看待，傳統上咸認為在國防安全這種議題領域，是由軍事實力、國民士氣、國家工業產能以及外交縱橫等和綜合國力有關的「硬實力」在左右著，而政治制度尤其是偏好特定政體模式的表達，這類更接近於政治立場之意識

形態的「軟實力」鮮有顯著影響。然而從近期台灣的政治實務來看，彰顯自身的民主體制比起中國的優越以及珍貴性，確實已經成為了眼下選舉重要的政治語彙。

長期以來地緣政治案例中，台灣便一直處於被中國以武力併吞的陰影。雖然兩岸在冷戰甫結束不久後，在美國的對中外交戰略定調在「接觸政策」的時空背景下，台灣問題曾在一段時間內因主權爭議在兩岸互動過程中被一定程度的擱置，相應地屬緩了兩岸關係的緊張程度。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後逐漸集中權力，對外政策也越來越頻繁地採取戰狼外交的模式，這使得中國威脅論開始再次於西方民主國家盛行起來。如此一來的後果是，中美之間的關係衝突越來越深，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逐漸轉為主要的競爭對手，這點從歐巴馬執政後期重返亞太開始可以看得出來。相對地中國也逐漸加強其在周邊的軍事活動以圖擴展其軍事行動能力，這些都進一步加深太平洋地區的區域緊張，如在解放軍在南海填島建造軍事基地，以及在釣魚台附近活動。當然對於台灣更重要的影響是，中國在台灣海峽附近的軍事活動越來越頻繁，解放軍機越過海峽中線或是繞行台灣周圍的情況逐漸增加，這些都意味著兩岸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低。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台灣人如何面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戰爭，就成為了很重要的課題。

無獨有偶 2022 年初遠在歐洲另一端的地緣政治熱點，俄羅斯的軍隊在普丁以「特別軍事行動」的名義下於 2 月底入侵了烏克蘭，爆發了烏俄戰爭。而在之後烏克蘭的在戰場上的表現令許多人出乎意料，成功抵擋了俄羅斯對基輔的進攻。這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後得成功的背後，人們同樣也驚訝於烏克蘭人在面對這場戰爭時，舉國上下所展現出來的頑強抵抗意志，而這正是被視為烏克蘭得以在後來取得勝利的重要基石。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烏克蘭人堅定的作戰意志，即使面對軍事實力大於自己的強權也不絲毫退卻？Norris 和 Kizlova（2022）於戰爭輔發生不久後當年 3 月的一篇文章便指出，除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族群認同因素之外，烏克蘭人自己對於自身民主制度的偏好與珍視，或許影響了人們在這場戰爭中保家衛國的決心。而這一項研究正好對於台灣此時此刻所處的局勢至關重要，因為就以往學術界在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研究案例中，台灣事實上在政治發展過程以及當今的地緣政治情境都有許多可以比較的相似之處。如 Wu（2017）指出臺灣和烏克蘭的相似性不僅是共同都面臨強鄰的外部威脅而已，兩國社會內部同時也都存在著國族認同的



深刻分歧，更複雜的是這種認同差異的形塑，乃是基於對於有威脅性的鄰國保有不同的歷史記憶而成。另一方面，兩國同樣是在冷戰末期開始開民主化的轉型過程，因此基於制度和政治價值的相似性同樣都渴求和西方締結安全同盟，但更重要的是兩國的民主化發展其實都伴隨著一定程度對威權鄰國的敵意，以及促進轉型的動能是建立在，與國內懷有鄰國認同的族群形成對立等存在著民族主義情感成份的基礎上。這些學術研究上的成果作為一定理據，不難解釋為何當烏俄戰中爆發時，迅速引發了台灣人對於烏克蘭的關注與同情，甚至喊出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口號，因為相似的處境意味著戰火有可能出現在台灣海峽。

因此，當強調堅持民主的論述出現在台灣外交場域中的情況日漸頻繁，而同時從過去許多針對台灣人在面對兩岸可能會發生戰爭的問卷調查結果來看，幾乎都一致顯示台灣人長期以來有很高的參戰意願。對照烏克蘭的例子時，這兩個現象或許並非單純的巧合。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雖然台灣人在外敵的威脅下，自然可以預期會激起保衛家園的意識，然而除了國族的因素可供解釋之外，是什麼因素影響了台灣人在防衛國家的意願，民主制度在這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會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然而在回答台灣人是否具備決心與意願保衛家園的問題上，首先要認清的事實是參與戰鬥的行為，本身即意味著得甘冒隨時會有失去生命的風險，因此能夠讓人們激起作戰的意志，通常都被視為是「特殊情況」。要解釋人們如何以及為何會有這一方面的行為，過去的討論人們主要會從兩大行為理論作為引用的解釋來源，一種是「理性選擇理論」，該理論解釋認為人們參與戰事的動機在於其參與的行為本身，背後能夠提供足夠大的利益，來抵消冒著失去生命風險的損失；而另一種則是根據「符號政治理論」，該理論則認為人類的政治行為主要會是受到政黨認同、種族、族群身份、國族認同、基本價值，以及對於特定政體或民族產生的依戀等長期政治傾向所影響（Sears, 1911），而非單純的自利算計，以該理論的解釋方式，會認為人們的參戰意願會受到上述傾向的影響，使人們不侷限於物質或經濟方面的行為動機，而可能有意願從事冒失去生命風險的行為。關於非理性選擇途徑的研究在實際案例的討論中，特別是族群或國族認同等身份因素通常會被當作分析的主要切入視角，背後的原因固然是世界上大多數的軍事衝突其起因多源於族群的對立以及少數民族爭取獨立。


台灣的政治研究始終無法脫離中國因素，作為一個相距不到一百公里遠的鄰居，中國素來在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政治分歧等問題上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纏（Achen and Wang, 2017: 4-12）。正因為台灣內部個人的族群歸屬與在國家層次上對政治共體的不同想像等議題，是被鑲嵌在台灣跟中國之間的分立之上的（Achen and Wang, 2017: 11），因此在探究台灣人的參戰意願的問題上援引「國族情感」等團體行為相關理論作為分析的途徑，是有一定的直觀合理性。從國族認同分歧緊扣著台灣統獨議題和對兩岸事務的立場的情況來看，在台灣只有極少數人願意與中國達成終極統一的背景下，這意味著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會把中國視為一個國安層面上潛在的外部威脅。因此由國族因素的途徑來頗析的話，也會同時呼應前面所提及的台灣人一直普遍有不低的比例具備參戰意願的現象，畢竟兩岸關係的緊張因子一直存在。然而，台灣對中國所懷具的威脅感，並不僅限於來自自身

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或統獨爭議，從前述提及台灣政要強調民主成就的論述益增的情形來看，彼此的政治體制差異似乎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 2019 年 3 月中旬，由香港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起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反彈聲浪，最終爆發演變成蔓延全港的示威行動，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核心目的的「反送中運動」。然而港府並沒有回應示威者的訴求，反而動用大量警力進行強力的鎮壓，過程中港警暴力的濫用震驚了全世界，尤其是引起了西方國家的關注，紛紛譴責了香港特區政府，並表達了對示威者的聲援與同情。這場運動的效應不僅加深了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威脅感，導致許多國家的中國政策開始出現了「硬起來」的跡象，對於台灣的政局更是有不小的影響。這場民主運動引起了不少台灣公民社會內部的聲援浪潮，「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為示威者參與運動時極具標誌性的口號，其背後的寓意為台灣一旦被中國統一後下場也會如香港一般的警語。而這場運動最終被視為，成功地激起了台灣人對於中國這個強鄰的帶來的「亡國感」，並隨之一定程度影響了台灣人在 2020 年的總統大選時的投票意向。

香港反送中運動對於台灣的特殊意義在於，過去臺灣民主化後的政治發展中，中國因素始終是選舉催化劑，但這主要是聚焦在國族認同分歧或統獨議題的意義上。然而過往無數的研究也已指出，臺灣人對於中國的負面感受中，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同時大部分研究與調查機構以往所做的民調也顯示，在調查有關臺灣人的民主價值傾向可以發現，長期而言大部分臺灣人對於民主制度確實是有穩定支持的。這也意味著對於中國的敵意和威脅感源頭，兩岸政治制度與生活模式的差異可能也在其中，如此一來反送中運動對台灣造成的政治效應，則或可視為是國家安全的問題與民主政治息息相關的案例，即人們基於對民主制度的偏好，導致一旦國家生存失敗，則也會失去自由的威脅感，被投射在捍衛主權的問題上。

因此香港反送中運動擴散出來的影響，實際上是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偏好甚至是認同，會影響人們對於主權問題優先考量的重要實例，那麼一個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若烏克蘭對於民主制度的正面肯定也會在抵禦外侮的確實發揮作用的話，那麼擁有相似情境的臺灣，在面對中國的威脅時，隨著中國的威脅程度上升時，臺灣人是否也有可能出現因為想要守護既有的民主制度的心理，也會提高自身防衛國家的



參戰意願？換句話說，台灣和中國一旦無可避免走向戰爭時，對民主制度的珍視會不會成為臺灣人防衛自己家園的重要考量依據？這種出於特定政治價值或信念，在「符號政治理論」中被視為會對於政治行為產生特定影響，而政治學界的「文化途徑」也曾一段時間被廣泛用來分析許多政治議題，然而這種分析方式，相比國族因素或族群因素的途徑，在參戰意願方面的研究卻並沒有很多，尤其是基於對於民主制度本身偏好的政治價值在這方面的研究更是罕見，因此這個問題本文將於後續章節進一步深入釐清與探究。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預計會分成 5 個大章節：第壹章開篇為緒論，主要會包含研究動機和研究問題意識，來闡述論文的寫作發想和研究意圖。第貳章為文獻回顧，本章會詳述過往文獻在相關問題方面已累積的研究成果，具體的內容方面大致上約略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聚焦在梳理由理性選擇理論延伸而來的理性途徑對於參戰意願的解釋，以及其相關的分析方式在參戰意願上的實際研究發現。而第二節則會討論非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途徑，主要是由「符號政治理論」所發展出來的兩種分析理論，該節前半部會先回顧「國族情感」方面對於參戰意願的詮釋方式，並在後半部討論本文所要引用的理論，特定政治價值或政治文化，也可以解釋對參戰意願方面會造成影響的論述。第三節則是在綜合這後面這兩種分析觀點的討論後，梳理過去台灣在兩岸關係方面的發展以及民主化、本土認同運動的相關歷程，藉此來和既有的理論進行對話，並且作為進一步說明民主偏好在影響台灣人的參戰意願上也可能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理據。

研究設計則會安排在第參章，在本章會綜合前面在理論和文獻方面的討論，提出本論文研究問題的核心假設，即民主偏好會對於參戰意願造成影響，以及預期效果，並清楚交代本文的研究架構，解釋變數之間的操作化處理方式。第肆章則會呈現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包含模型運算出來的結果和發現，以及針對變項之間產生

的效果進行詮釋和分析。第伍章為本文的研究結論，同時也會一併指出本文的研究限制以及不足之處。最後則是羅列在撰寫過程中，所有促進本文的概念建構與討論而採用的參考文獻。





第貳章 文獻回顧



要解答本文主要的問題，首先必須先梳理在過去的研究當中，有發現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人們參與戰鬥或軍事活動的意願。從人類有歷史以來，關於戰爭的記載變從來沒有間斷。可以說但凡有人群所在的地方，戰爭就一直同時存在著。在解釋戰爭為何會發生這點上，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概念提供了些許理由，人類與生俱來的無窮慾望和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一旦不存在彷彿巨靈「利維坦」一般由至高權力的共同體所構成的政治秩序，人們便容易淪為相互為戰、爭鬥不止的狀態。然而無論是為了滿足什麼樣的目的而將戰爭作為達成的手段來運用，一項有關戰爭的本質無可否認的事實是，進行戰爭的代價所費不貲，除了戰爭維繫所必須消耗的資源外，戰鬥過程中對於財產造成的損失更是高昂，而最要緊的莫過於在前線交火得冒著隨時都有可能失去性命的風險。正是因為如此，若要能驅動個人參與戰爭，個體就要具備很強大的動機足以克服抵抗犧牲生命念頭的心理機制，而能夠滿足這項條件的因素，既有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兩大類型：「理性因素」以及「文化（情感、價值）因素」。

第一節 理性選擇—社會人口、社會經濟因素

理性因素的分析途徑即源於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假定人性本能普遍有著「趨利避害」的行為模式，而人類的做決定的選擇主要是基於不同選擇方案所帶來的可能成本和利益之間的算計（Sears, 1991），而參戰意願在該理論的解釋下也被當作是某種個人經過衡量算計後所做出來的選擇偏好。也因此該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不願意參與戰爭，是因為會失去性命這點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都是不利的；而反過來說，若是參戰對於該個體而言能夠帶來其他好處，使得人們損益相衡下有足夠的利益支撐起甘冒失去生命的風險，也就會有動機能夠提升個人的參戰意願。具體

的研究方面，理性選擇最基本的分析方式也是從個人的經濟條件來切入觀察社經地位差異與參與軍事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由於軍隊在大多數國家而言，都還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職業¹，因此理性選擇一派常見的觀點會假定**參戰意願與經濟條件或社會階級地位等因素息息相關**。換言之，參戰意願的高低與否，取決於服兵役對於人們的吸引力，在這個前提下，普遍的觀點會認為社經地位相對較為弱勢者比起有優勢的人而言，則越有可能有志願從軍（Lutz, 2008: 167）。除了收入作為對於個人吸力因素以外，Torgler（2003）也從不同的「社會—人口」（socio-demographic）屬性結合理性因素，對於選擇從軍作戰的風險承受能力差異嘗試來解釋。因為不同的人由於其生活條件不盡相似，會造成當人們放棄既有的生活的時候所必須承受的**機會成本**也不一樣，就此可以假定收入級距較高的人，相較於級距較低者會更加不願意服兵役。同樣的道理，可以推論在年齡層、教育程度、婚姻狀態等人口特徵上，也會出現衡量機會成本的效果。年齡層方面，越年長者因其生命歷程長遠，事業發展都已趨於完滿，本身也可能持有較多的財產，所以機會成本應該會大於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職涯發展上有其他選擇，因此從軍的成本也會比較高；有家庭婚姻生活的人，生活包袱也比起單身者更大。而對於這些社會地位較為弱勢或是社會角色比較邊緣的人來說，即使從軍也對既有生活的損失較小，因此相較之下更有可能有更高的服兵役意願（Torgler, 2003: 265-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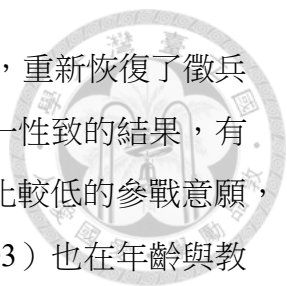
但是實證研究的成果顯示，上述的理論假定在不同時序、不同國家的案例上的結果並非一致穩定。以社經地位的變數而言，部分文獻在一些國家的研究案例中確實有呈現出前述收入級距和從軍作戰的意願之間的負相關性，如 Lutz（2008）在分析比較了美國有在軍中服役過的人口組成後，發現不曾服過兵役的人在高收入群體，

¹ Glen Elder, Cynthia Gimbel, and Rachel Ivie（1991）的文章有提及不少美國的退伍軍人會把自己在軍中服役的時期，視為是自己人生的「積極轉捩點」（positive turning point），這是由於軍中的軍事訓練除了增進作戰技能之外，同時也多少會強化部分工作技能，加上美軍優渥的退休保障與進修制度，能夠讓軍人退伍後有不錯的收入與接觸高等教育的機會，進一步促進自身的社會階級向上流動。

確實比起收入級距末尾的人來得比例更高。但 Torgler (2003) 比較多國的研究結果卻指出，以社經地位在測量人們參戰意願時，並無明顯的顯著相關性。

Anderson 和 Getmansky 以及 Sivan Hirsch-Hoefler (2018) 則嘗試進一步釐清社經地位差異對於個人表達參戰意願的效果是如何作用的，以解決跨國層次的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不足之處。三人在理論的引用方面大致上同意 Lutz 的研究成果，但是更聚焦為什麼在富有者會比貧窮者更不願意從軍的背後緣由。Anderson 等人給予的解釋是經濟條件較為富有者會考量到發生戰事時，貧困者被動員的成本 (mobilization cost) 高低，進而衡量自己服兵役是否划算。白話來說就是社會內部的窮困群體是否比較傾向以犧牲生命的風險換取優渥的軍餉報償，如此一來就可能坐實「有錢人能夠以金錢雇傭窮人為國而戰」(Lutz, 2008: 184-185) 的說法。依照這個假定，Anderson 等人結合先前民調發現各國之間的參戰意願比例高低會出現因各國本身經濟平等與否而有所差異的結果，主張測量個人的參戰意願時，同時必須考量到一國內部經濟不平等的情況對個人收入高低的影響。因為如果某國的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比較緩和，那麼對處於該社會收入級距末尾的人而言，軍隊作為職業選擇的吸引力不會那麼大，單憑經濟因素而願意冒生命危險的可能性應該也會比較低。如此一來，承擔兵役就必須公平地實施才會為人所接受，經濟條件的差異在這裡就會比較不明顯。由該論點 Anderson 等人順勢補充各國的參戰意願差異，在兵役制度上是屬於徵兵還是募兵制可能也會有所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確實在納入各國的基尼係數後，跨國比較顯示越不平等的國家，該國中的經濟地位較高者相較之下，比較不願意為國而戰；而兵役制度為徵兵制的國家在參戰意願上比較高這一點也得到證實，解釋了個別的制度脈絡差異因素，除此之外人口基本變項上，Anderson 等人也測量了年齡的因素，得到了符合前述的假設結果，年輕族群確實比老年人更有保家衛國的參戰意願。

然而 Andžāns 與 Sprūds (2020) 在進行深入比較波羅的海三國防衛意願的研究時，卻發現了和上述文獻不盡相同的結果。兩人根據一份針對波羅的海三國共同執行的調查計畫資料分析，在貫時性的研究上經濟因素、年齡層，以及兵役制度都得不穩定的效果。如拉脫維亞 (Latvia) 在獨立後貧富差距有些許擴大的現象，但是參戰意願的變動趨勢卻並非一直下降，反而在 2014 年後回彈。另外，立陶宛



(Lithuania) 在 2014 年後為了因應俄羅斯侵擾烏克蘭東部的危機，重新恢復了徵兵制，然後該國的防衛意願依然持續降低。在年齡層方面，則沒有一性致的結果，有其他研究波羅的海國家的防衛意願的調查結果顯示老年人表現出比較低的參戰意願，但兩人手上的資料所呈現的則是相反的結果。同時，Torgler (2003) 也在年齡與教育程度測出不穩定的結果，Torgler 比較了美國、瑞士、挪威、西班牙和西德五個國家，年齡因素方面發現對比 16 至 29 歲的最年輕族群，美國與瑞士分別出現了老年 (50 至 64 歲) 與中年 (30 至 49 歲) 反而有更高的參戰意願的結果，而教育程度高低和參戰意願的相關性方面，只有西德和西班牙有顯著負相關，美國甚至出現了顯著正相關性。上述都使得基於經濟因素、物質主義、理性選擇導向的解釋變項備受質疑，Andžāns 與 Sprūds (2020) 的研究中發現前述的變項都不及波羅的海三個的俄裔族群比例更能一致地解釋三國的防衛意願變化增減，Torgler (2003) 自己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只剩民族自豪感 (national pride) 能成功提供對參戰意願比較一般性的解釋效果，因此他認為個人有關參與戰爭的意願高低，很大程度並不是出於理性因素的影響。

第二節 符號政治理論—國族情感與文化途徑



本文在緒論中已提及會對參戰意願造成影響的符號政治理論因素，主要兩大類型：一是，有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國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可能會在個體層次上刺激個人支持國家的對外政策；另一個則是物質主義衍生的政治文化，其中的部分價值可能會與對戰爭活動的態度息息相關。以下將進一步闡釋。

（一）國族情感—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國族情感之所以可以刺激人們參與軍事活動的意願，關鍵在於能夠提供驅動人們「自我犧牲」的動機（Puranen, 2014: 261），而其解釋路徑主要參考的是在社會心理學的「團體理論」中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人們所組成的團體會造成對個別成員的影響。人類會組成各式各樣的團體的同時，也表示一個團體在身份資格上有著屬於內團體（in-group）的「我群」和外團體（out-group）的「他者」之分。「團體威脅理論」（group-threat theory）則為造成人類社會衝突的原因提供了解釋，認為人類本來就會有區分彼此的本能，在感知到「生存壓力」（existential pressure）的情況下，就很容易對他者激起防衛心裡，也會對於「我群」產生更強的認同感。

不過從凝聚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到關聯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敵意，這中間環節的轉化機制具體和基礎為何？大多數研究民族主義和團體理論的文獻都會回到 Adorno（1950）所提出的「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作為解釋，對於國家、民族投以過度情感的人，往往也意味著對於團體的價值和規範越傾向無條件服從，這也使得這些人很容易盲目，進而在愛國情緒渲染下對於外國人產生敵意，甚至是仇恨。而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過成提供這類意識型態的滋長溫床，比較著名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如 Ernest Renan（1882）就提及「民族」的形構過程中，除了強調文化、語言等原生屬性的同質外，成員之間共同的「苦難」歷史記憶

更是凝聚認同感上的重要素材。現實的歷史經驗中，大多數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過程也確實和革命、戰爭、去殖民等重大事件脫不了關係。這也意味著民族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其生成與鞏固本身有賴於和「外邦人」的「對立」這點。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民族主義也被認為是愛國主義的心理基礎 (Dood, 1964: 6)，因此早期的文獻多數認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密不可分。但這樣的看法會有問題，因為一個人有可能確實對自己的國家表達出熱愛的忠誠，但不一定會陷入盲目地對當局權威的服從，因此 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 和 Sanford's (1950) 最早基於對於權威性人格的研究，認為有愛國主義和「虛假的愛國主義」(pseudo-patriotism) 之分。而其他學者則嘗試進一步區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Kosterman & Feshbach, 1989; Feshbach & Sakano, 1997; Nathanson, 1997)，基本上愛國主義被嚴格定義為「個人對於自己國家所懷有的情愫」，也就是對於「國家的依戀程度」(the degree of attachment to the nation)；而民族主義則傾向於表現的是自己「民族的優越性與主宰地位」(national superiority and national dominance) 以及「對於其他民族的貶抑」(downgrading comparisons with other nations) (Sapountzis, 2008: 36)。

基於這個區分基準，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基本上被認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族情感，民族主義往往被視為是一種負面的國族情感，由此激發的愛國心被視為是盲目的，甚至是由民族國家的掌權者形塑用來操控人民的意識形態 (Diaz-Guerrero, 1997)，所以比較有傷害性；反之，愛國主義不僅被視為比較無害。因此在實際的研究測量中，會基於兩種情感的理論預期，先解析出各式各樣的態度，然後依據各自的行為表現來檢視個體受到屬於何種情感的影響。如 Gries、Zhang、Crowson 和 Cai (2011) 以中國人對於中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強硬與否，會不會受到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影響發現，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感到自豪，熱愛中國的人，不見得會支持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或視美國為威脅，反而是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愛國主義」越有可能對於西方世界環抱比較強烈的敵意。Skitka (2005) 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針對美國人歷經 911 事件後在是否有展示國旗的行為與展示國旗的頻率上這兩件事上進行研究後，發現美國有愛國主義態度傾向的人，不見得與民族主義者表現一致。

透過上述針對國族情感個別面向的分析，可以初步歸結若是當人們感受到所處的政治共同體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會激起主要是愛國主義面向的情緒，進而影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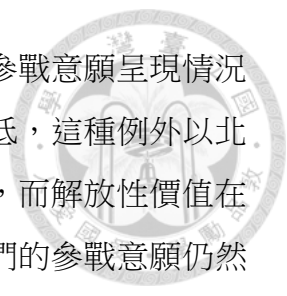
保家衛國的態度從而提升個人的參戰意願。這個解釋方式相當直觀並且與有著大量過往的實際軍事衝突案例作為佐證，也因此自然很適合作為分析傳統上有著安全問題的國家的途徑，而台灣就是相當典型符合此一要件的個案。



（二）文化途徑—後物質主義與政治價值

理性選擇的因素之外，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提供了滿足人們展現「自我犧牲」的意願的重要動機理論，在前面已論及這是影響人們參戰意願相當重要的條件，屬於一個正向刺激作用的解釋方式。而價值文化因素方面的影響，除了相較之下研究成果較少之外，僅有的文獻觀點亦認為一般來而言特定政治價值對人們的「自我犧牲」意願，所形成的反而是負向的影響。這類的見解主要是依據政治文化的解釋途徑，其引用的理論是來自 Inglehart「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概念。「後物質主義」主張人類社會隨著工業化發展越來越發達，當物質生活的條件同樣越富足時，人們就會轉向「非物質」需求的滿足，如精神、價值等。與此同時高度的發展也會帶來在人口預期壽命提高以及教育普及等變化，這些轉變會使得要求報效國家和自我犧牲越來越困難。一來是所受的教育越高，人們越有可能對於權威和戰爭的意義有所質疑，而壽命的延長則意味著「生存機會」（life opportunity）日益大於「生存威脅」，種種影響綜合下來就是導致人們越來越重視過生活的方式必須是自己喜好與中意的觀念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相當普遍。也因此，「解放性價值」（emancipative value）為逐漸變成該社會中很重要的政治文化，人們會很強調普遍選擇的自由，而這些都奠基在「有前景的生活」（promising life）所提供大量的機會為前提的（Puranen, 2014: 261-262）。據此言之，「犧牲生命」與渴望「有前景的生活」這兩件事是大相徑庭的，這也導致人們自然會覺得自我犧牲去作戰的觀念變得難以接受，而且也是在白白糟蹋自己的前景（Puranen, 2014: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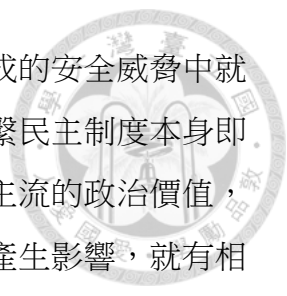
雖然 Inglehart 和 Puranen 等人認為一般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所產生的政治文化與價值，對於參戰意願的影響應該是以負向刺激的作用為主，然而在兩人的研究



發現實際上還有一些幾個比較特殊的個案，在這些國家中人們的參戰意願呈現情況並非如其預期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或是解放文化越廣為接受而降低，這種例外以北歐國家最為突出。雖然北歐各國的各項發展指標幾乎都名列前茅，而解放性價值在各國社會中也幾乎被廣泛接受甚至已經成為主流的文化，然而他們的參戰意願仍然普遍比起其他已開發國家相對來得高。兩人皆認為這樣的現象或得援引北歐國家的歷史脈絡來解釋，即冷戰的背景。如 Inglehart 即認為，北歐國家在冷戰時期因比鄰著與自身體制差異極大的外部威脅—蘇聯，這導致北歐國家有著迫切的安全需求，從而造就了比起其他西方先進國家來得更高的防衛意願。Puranen 則進一步延伸闡，主張北歐所展現的不單只有軍事與國防層面的意義，地緣因素更是或多或少影響了北歐社會的主流價值。即北歐國家基於過往的國防經驗，在民主經濟、社會高度發展的同時，北歐人不僅擁抱其傲人的民主表現和進步成就，視為其立國信念，且在推動這些價值的目標上也願意採取「積極性」的對外政策方式。這也造就了北歐人將參與國際建制、維和行動、持續強化武備以及捍衛國土安全等，視為是在為維護其社會所尊奉的民主、普世人權和進步價值的促進作出貢獻 (Puranen, 2014: 271)。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或軍事研究中，往往會將人民的參戰意願或是抗戰決心僅視為國家安全問題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 議題範疇，也因此以國族情感作為主要取徑的解釋方式自然成為合理的分析方法。然而北歐國家的特殊情況顯示了，可能影響參戰意願的因素不光是只有民眾應对外部威脅時所懷有的心理情緒反應，而是會和原本社會內部自身的一些條件如文化或價值產生關係。這種出於擁護特定的制度模式或是政治價值文化，進而提升參與軍事活動意願的論點，其實也在 Skitka (2005) 分析美國 911 事件是否激起愛國主義的研究中獲得呼應，他發現懷有愛國主義傾向的人，在面對威脅時所展現的主要情緒反應是鞏固美國核心價值的堅持，而多過於負面的仇恨或憤怒。

而透過國族情感理論和後物質主義在北歐發展的情況等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歸結出人們的參戰意願確實會受到文化或信念等因素的影響，而其中基於維護特定的政治立場及政治價值的理由，人們可能會展現出更高的意願參與軍事行動。雖然台灣的地緣政治條件在解釋參戰意願的問題上，國族情感是一個相當直覺合理的分析視角，但觀諸民主偏好度的相關調查在台灣的结果普遍顯示不低的情況，足見台



灣人對於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視與偏好，而中國對台灣構成的安全威脅中就包含了民主體制的存亡，使得在維護主權與實質獨立這件事和維繫民主制度本身即有一層緊密關係。因此視偏好或珍視民主政治作為一項台灣社會主流的政治價值，以文化的途徑分析台灣人的參戰意願是否也會如北歐的案例一樣產生影響，就有相當的理據基礎。本文會於下一節深入台灣的政治境況來分析，民主偏好能否作為解釋台灣人參戰意願的合適推論。

第三節 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發展回顧

根據前幾節針對會影響參戰意願的因素，提出相關對應理論所累積的討論成果，基於制度與政治價值的偏好，而對於保家衛國具有高度共識的社會，通常都是處於過去有地緣外部威脅的國家，因此要解釋台灣的參戰意願是否受到民主制度的偏好與中國威脅的影響，關鍵就在於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如何和本身的對外關係中的安全問題產生聯繫。本節將會回顧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台灣民主化歷程，藉此來闡釋當代中國如何構成對台灣的威脅因子，以及民主制度的發展如何在外局勢的變化下，與其他社會內部本身的問題產生聯繫以取得更廣泛地深化基礎。

（一）威權時期：冷戰煙硝下的對峙

台灣與中國大陸本身的關係從歷史來看，有確切文字記載且普遍證實的可以溯及約 400 多年前的大航海時代，台灣本島即有明確的漢人活動蹤跡，而隨著後來的明鄭與清帝國兩個政權的對壘下，台灣始被正式納入中國本身的政治影響中。不過當代意義上俗稱的「兩岸關係」，則是要到晚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國共內戰導致兩岸分治的局面底定後才形成。1949 年中隨著中國國民黨將國民政府的中央機構與大量軍隊、公職人員撤退至台灣以後，宣告了國民黨結束在中國大陸的統




治，而僅剩台灣還有福建、浙江沿海些許島嶼尚未淪陷於中國共產黨手中。一開始整體局勢對於蔣介石而言，國民黨政權無疑岌岌可危，然而沒多久爆發的韓戰，則是將台灣正式納入冷戰的西方陣營體系之中。

在這個時期，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續憑藉著 1951 年與美國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獲得西方軍事援助，而暫時得以免除被中共解放軍入侵的威脅。在冷戰體制底下，雖然沒有台灣海峽並沒有掀起大規模動搖格局的軍事衝突，但中國共產黨喊話要「解放台灣」，而國民黨基於其統治的合法性也堅持「反攻大陸」，因此兩岸之間處於戰爭煙硝瀰漫，但是國際上美、蘇都不支持雙方動武改變陣營間勢力範圍的詭譎態勢（若林正丈，2016）。為了應付這種新型的國際情勢，國民黨一方面對內實行威權統治來控制台灣的社會，另一方面對外則堅持延續其「中國唯一代表的合法性」作為在台灣的正當性基礎，國民黨的這些措施，在西方陣營基於冷戰的戰略需要下，獲得了美國的支持。

（二）斷交與戰略、政策的轉型

這種台美之間高度緊密的正式同盟一直延續到了 1970 年代發生轉變，蘇聯與中國的關係由毛澤東時代的一面倒變為緊張，使得美國開始重新調整其外交戰略，轉向拉攏中國。1971 年季辛吉代表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以及翌年 1972 年尼克森訪中並共同發表《上海公報》標誌著這種轉向正式啟動，在此背景下，台灣自身的外交處境也愈發艱難。在 1971 年 10 月，阿爾巴尼亞提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時任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旋即為抗議之故而退出聯合國後，與中華民國斷交改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的國家日益增加，最終台灣也於 1979 年和美國斷交。

從退出聯合國到和美國斷交這兩項重大的外交事件期間，對於台灣的國際處境形成相當嚴峻的挑戰，一來是隨著美國外交轉向而終止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造成台灣不再明確受到美國明文的軍事防衛義務保護，二來《上海公報》的聲明中明



確表示對於「一個中國原則」（以下簡稱「一中原則」）的堅持，而中國長期也一直以承認（或至少不明確表示異議）一中原則作為其他國家和其建交的前提，等同於斷絕了中華民國獲得國際社會正式外交支持的空間。這些都導致台灣在外部面臨了極度不確定性的安全危機，縱使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的立法試圖維持與平衡對台曖昧的軍事聯繫，其結果都使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陷入窘境。由於世界多數國家與中國的建交，進一步危及到國民黨以往以「唯一合法正統中國」自居的合理性，這種雖然退守台澎金馬，卻仍舊堅持固有「大中國」疆域的敘事，在過去美國出於冷戰的需求而力挺中華民國外交方針的情況下，為國民黨提供了「外部正當性」，如今隨著外交關係受阻，中華民國也不再普遍受到國際社會承認後就一併動搖到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基礎。為了適應外部環境的變遷所引來的挑戰，這時期國民黨也在蔣經國逐漸接掌大權的背景下，開始黨內外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在內部推動「吹台青」的政策，以拔擢更多年輕本省籍政治菁英進入體制來擴大國民黨在本土的統治基礎，在外部則開放針對中央層級民意代表的「增額補選」來回應國內反對勢力的壓力，這也無形之中拓寬了台灣的參政空間，為日後民主化進程做鋪墊（Cheng, 1988）。

在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兩岸關係的態勢在此時也發生轉變。雖然「上海公報」發表後標誌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終結對中華民國的直接官方往來，但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的訂立，依舊希望維持與台灣在民間方面的「非官方」往來與對台的防衛性武器軍售關係，並強調與中國的建交是基於「以和平手段解決台海問題的期待」作為前提，並在雷根政府時期對蔣經國提出主旨在確保台灣足夠自衛能力的「六項保證」（李潔明，2003）作為對台軍售一切政策問題的依據，確保美國在放棄對台的防衛義務後依舊保有防衛台灣的權利（松田，1998）。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對台政策也出現變化，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強調「祖國和平統一」取代毛時期的「解放台灣」，同時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向台灣喊話以期增加「統一」對台灣人的吸引力，並呼籲「三通」、「四流」希望與台灣全面接觸、交流。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攻勢」，在台灣方面蔣經國則提出「三不政策」，堅持在政治與官方層面「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來因應，但是民間方面的交流乃至貿易往來則不可能完全限制得住，在 1970 年代末至整個 1980 年代期間相繼放寬貿易的往來與開放

探親。以此雙方由純粹的軍事對峙，逐漸轉為政治上的對抗，但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的情況。




(三) 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與兩岸互動



台灣的民主轉型大約從 1980 末期開始，並於 1990 年代在李登輝總統主政下完成許多重要的憲政改革。承繼蔣經國執政晚期的政治改革，增額補選使得參政的管道和空間增加，「黨外」等反對力量的崛起對於更多政治自由化訴求的力道也逐漸加大，「美麗島事件」與「陳文成命案」等引起美國與國際社會的關注，對於國民黨政權施加壓力，讓民主運動獲得一定的外部支持空間，在此種種條件下促成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與政治自由化和民主運動同時並進的，還有隨著本土化而來的台灣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

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早在日治時期反對殖民主義的聲浪中就出現，然而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接收與國共內戰所形成的兩岸分治、軍事對峙的局面，使得任何「台獨」色彩濃烈的聲音都為堅持「中國法統性」、尊奉「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當局強力打壓。在威權統治時期，就不少具有台獨信念者反對當局而被迫流亡海外。讓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再興出現突破的主因，還是與退出聯合國以及和美國斷交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外交窘境，使得「大中國」的官方敘事在論述上越來越站不住腳，與此同時隨著中產階級增長、越來越多知識分子留學過海外，對於自由化的訴求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為更多人接受，這也導致許多當時的反對派有志之士將反思國民黨黨國體制本身一同投射在其官方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另一方面，在爭取民主化的運動過程中，認同的動員也成為對抗國民黨威權的訴求的重要方式，結果就是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裡，爭取民主某種程度實際上幾乎可以和台灣認同的建構高度連結 (Steven, 2016)。

即使在解嚴之後，台灣的認同問題又因牽涉到兩岸關係，使得認同分歧所衍生的問題依舊存在。過去大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是官方的指定立場，台灣民族主義或（謹慎來說）本土意識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打壓。隨著民主化後本土意識高漲且國民黨失去對意識形態的控管力後，加上中國經濟崛起，對中國的認同被反過來投射在「祖國」身上。在民主化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很高程度倚賴著雙方彼此緊密且頻繁的經貿往來，因此可以說兩岸之間的經濟政策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但台灣的國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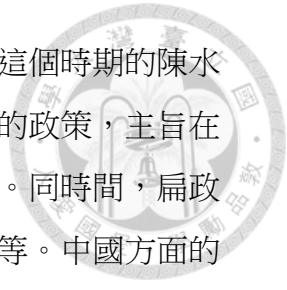


認同問題在這之中又會左右對於兩岸交流的態度，形成在不同政府時期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對於時下兩岸互動情形的意見群集。在台灣認同鞏固的前提下，不得不出於經濟因素和中國得維持一定程度的交流，同時又得考量國安問題而在偏向開放交流與限制之間擺盪的「中國兩難」，構成了台灣的中國大陸政策變化動態（林夏如，2019）。

在李登輝剛上台之初時，於 1990 年成立「國統會」（國家統一委員會），並於翌年頒布《國統綱領》（國家統一綱領），與此同時台灣前往中國投資與進出口的政策也一併逐漸鬆綁。北京在此時也遞出橄欖枝，對台政策改以和台灣進行接觸，設立「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作為半官方主理對台事務的單位，和台灣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對口，為雙方會談作準備，並在 1992 年討論中方的「一中原則」要求，在這期間的信件往來成為了日後的稱做的「九二共識」，隔年以九二共識為基礎，雙方最終在新加坡由分別代表台灣海基會的辜振甫和中國海協會的汪道涵舉行 1949 分治以來的首此會談。

然而 1994 年兩件事的發生又讓兩岸關係降溫，一是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專刊訪問時，提及「台灣人的認同」，二是台灣旅客在浙江千島湖觀光卻被殺害的「千島湖事件」，中共地方官員的消極處理方式，翻轉台灣人對中國的印象變得負面。1995 年，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其內容涉及呼籲中國尊重台灣的民主價值，以及提醒台灣方面有意維持分立的局面直到中國自身民主化，此舉激怒中國而北京方面以飛彈試射和軍事演習作為回應，並且於 1996 年台灣首次總統直接選舉又在此故技重施，以此作為恫嚇。飛彈試射所導致的台海危機其結果，除了助長了台灣分離主義的情緒，另外美國雖然一面安撫北京表明其反對台獨的立場，另一方面則又透過派遣艦隊穿越台灣海峽來介入，使得兩岸關係再次變為劍拔弩張的局面。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李登輝對於兩岸的經貿往來採取「戒急用忍」的政策，又再度限制台商在中國的投資。


2000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由代表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達成了台灣自民主化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然而甫上台之初的陳水扁政府即面臨執政的困境，首先內政方面，2001 年後台灣的經濟成長開始下跌，而中國這時已經是台灣前三大貿易夥伴，府會關係方面則在立法院多數黨仍為國民黨的情況下，形成「分立政府」導致施政



會遇到阻力。種種條件下讓陳水扁政府初期，不得不向中間靠攏，這個時期的陳水扁的對中政策也偏向溫和，如在其就職演說中聲明「四不一沒有」的政策，主旨在向華府與北京傳達其沒有要在其任內宣布台獨，也不排除統一選項。同時間，扁政府也做出若干示好動作，如啟動小三通、研擬台商赴中投資的放寬等。中國方面的對台政策在陳水扁初期，也一改在李登輝晚期的「恫嚇」手段，改以比較溫和的「反獨」作為主要的目標，但整體來看還是基於對台獨政黨的不信任，中國此時採取的對台方針依舊偏強硬，如拒絕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會談、繼續軍事演習，以及阻撓台灣出席國際組織會議。

然而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尾聲，在經濟問題持續無法好轉，分立政府導致僵局與政策不連貫等情況下，陳水扁民調開始下滑。即使在 2004 年大選因「槍擊案」驚險連任後，民調也不見反升，2006 年後陳水扁又被爆出貪腐醜聞，這些事件都使得陳水扁於第一任期後半和第二任期之間，在兩岸關係的政策上大幅翻轉。為了鞏固其「深綠」支持者，在 2003 年陳水扁政府即推動把「和平公投」納入翌年的總統大選一同表決，並在 2006 年宣布《國統綱領》不再適用且停止國統會的運作。在這期間，中國則於 2005 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明訂若台灣走向獨立或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不存在時，中國政府就會「依法」動用武力。這也導致兩岸關係在扁政府第二任期又從原先台灣單方面示好，變成雙方再次緊張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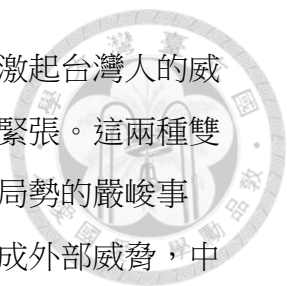
馬英九在陳水扁執政晚期台灣經濟陷入困難、外交政策又左支右絀，以及國家元首深陷貪腐醜聞等致使民進黨選情低靡的情況下，贏得了 2008 年的總統大選。然而馬英九上台後並未實現直接改善國內經濟條件的目標，反而幾乎將施政重心幾乎放在開放兩岸關係上，甚至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之道就在兩岸關係的增進。（林夏如，2019）因此在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處於升溫的狀態。在政治層面，馬英九就職時即申明「不統、不獨、不武」，並接受「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中國也在馬英九上台不久旋即恢復兩岸的對話管道。在經濟方面，馬英九政府繼續放寬台商赴中國投資的限制，並在幾輪「江陳會」中達成幾項協議，包含全面開放通郵、通運的「大三通」，首次開放中資來台投資，以及簽署金融合作相關的備忘錄。這時期兩岸協議當中最重要就是在 2010 年第五輪江陳會中簽訂的 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包括一項框架協議與《貨貿協議》（《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



議》)、《服貿協議》、《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後續協議。然而 ECFA 的簽署為馬英九日後同樣帶來不小的衝擊，早在協議剛簽訂不久時，支持者已不到五成（林夏如，2019）。與該議題交織的是，認為兩岸談判步伐太快的人在這個時期有大幅增加，同時認為北京對台灣人不友善的比例也不低（林夏如，2019），顯示不少台灣人對於馬英九政府所採取的積極開放政策所導致國安問題是有所擔憂的。這也導致後續《服貿》協議送交立法院審查時，引發反對者的抵制並爆發「太陽花學運」，導致馬英九的民調再度下滑，而民眾對於更嚴格地審查和監督兩岸協議制定的聲音有所增加（林夏如，2019），並且造成國民黨在 2016 年大選的潰敗。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後，改以「新南向」作為取代馬政府時期全面「西進」的經濟政策，而中國方面隨著軍事和經濟實力增長，解決台灣問題變成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首要課題。因此中國在此時的對台政策又轉為強硬，如 2017 重申反對台獨之外，2018 年習近平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針對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條文，佈局謀求自己長期掌權的同時，也越來越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統一台灣就是最重要的部分。而 2019 年習近平再〈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講話中，提及台灣必須接受九二共識且以「一國兩制」作為統一方案。這樣的論述激起了台灣民意反感，並且讓蔡英文有機會展現捍衛台灣自主性的決心，其回應演說中強調「民主價值是台灣人民所珍惜的價值與生活方式」，這使得原本在經歷「一例一休」、「同婚公投」後民調下滑的蔡英文其民意支持度因此回彈。同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中共針對香港參與運動的學生採取鎮壓的暴力手段，讓台灣人對於和中國統一的要求更加抗拒。也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解放軍的軍艦與軍機在台灣海峽的活動變得頻繁，這類擾台事件迄今也多此發生。

回顧過往的兩岸關係發展史，可以發現在民主化以後，台灣與中國的交流互動模式便處於林夏如（2019）所形容的來回擺盪的情況，而造就這個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堅持將台灣納進「一中原則」的統一架構底下，並堅持把對「一中」的承認當作任何接觸與對話管道開放的前提，但同時又明言絕對不會放棄武力的使用來當作達成統一的底牌；二是偏偏對於台灣人而言，真心嚮往統一的人始終是極少數，「維持兩岸現狀」這種雙方實質分治的狀態是大多數人的共識。因此不願意失去政治自主性作為台灣主流社會的意見，始終和中國堅持的祖國統一存在不



可消解的分歧，而一旦中國有任何試圖促進統一進程的動作，就會激起台灣人的威脅感，轉而支持表態更加不願妥協的政治人物，使得兩岸關係變得緊張。這兩種雙方立場的拔河形塑了整個解嚴後的兩岸關係動態，也道出一個台海局勢的嚴峻事實，即在各自立場都不容退讓或改變的條件下，中國始終對台灣構成外部威脅，中國在國際舞台對台灣的外交打壓和軍事威懾也確實從未間斷。

另一個與兩岸關係習習相關的，則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在過去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原本就與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台灣認同的主流化過程密不可分，而在台灣認同鞏固的過程中，台灣社會歷經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分歧與對抗，並反應在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生態中。與此同時中國持續對於台灣進行的促統舉動，又進一步加固台灣認同化，可以說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就是同時參雜著內部的認同極化和外部威脅這兩項要素（Chang & Chu, 2011）。而外部威脅對於台灣民主化直接影響是，出於必須尋求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來保障自身安全，在政治制度向自由民主陣營靠攏，是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同情與支持的重要辦法。所以堅持民主對台灣而言也有維繫國家生存的目的於其中。如 Cheng（1988）的文獻就指出，過往有部分國民黨內的「溫和派」（soft-liners）之所以對於台灣社會爭取民主運動的反對勢力願意採取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其中一項理由就是希望藉著台灣民主化，能夠增加避免被中國統一的籌碼。因此中國威脅不僅是對於台灣認同有所影響，在早期推進台灣民主化成功上，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推力，這也意味著民主制度在拒止和中國統一這件事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由於其發展歷程和認同意識、安全高度重合，造就了「民主—威權」之間的制度選擇問題，同時緊扣著「國族建構」和「共同體生存」等民族主義與外交、國防問題。這些脈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論據來說明，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支持與選擇和國家安全、維護主權等議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密切關聯。如此一來即有一定的理由延伸推論，基於前述的針對文化因素研究的討論，堅持捍衛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或政治價值，台灣人高比例的參戰意願是否真的正好和對民主的制度偏好是有關的？



第參章 研究設計與假設



第一節 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提及的研究文獻，本文主要測量的是臺灣人在個體層次方面所表達的民主態度，對於問及假設未來台海爆發戰爭的情況下，針對到時候是否願意為了保衛臺灣而上戰場的意願有無關聯性。但是在關於民主偏好態度的測量方法則有許多討論，過往大部分學術研究在實務操作上對這個問題的作法，大致將民主態度會區分為「民主滿意度」（*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和「民主支持」（*support for democracy*）兩大面向。這兩種面向被普遍用來當作是診斷人們主要是基於什麼類型的理由而偏好民主的觀察指標，前者對應的是依據民主政府實際的治理表現來給予評價，這種制度偏好所表達的會是一種「實然」、「工具性」導向的態度，也就是說一旦民主政府的實際表現變差，則對民主制度的好感可能也會下滑；後者則是評估人民是否具已備接受民主本身作為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信念，是出於「抽象」、「內在」的價值而偏好民主政體。因此這類型的民主態度比較不會受到外部因素如政府效能、經濟情況等影響其對民主的正面評價，而是傾向會因為民主政治所體現的「自由」、「人權」等價值而依然偏好民主制度。將民主態度二分區別開來的方式在過去研究臺灣民主化和民主鞏固等主題的文獻中，也常常被應用於分析臺灣人的民主態度變遷，如黃信豪（2011）、張佑宗（2011）等。

若是出於認同民主制度，而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的話，對於民主制度應該會表達出較為正面的評價，因此防衛意願高低就可能與民主支持和民主滿意度的評價是存在正相關性的。但若是出於信奉民主的內在價值，「無條件支持」民主的可能性越高，反之若是出於工具性的目的，則有可能對民主的偏好就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據此可以合理推斷在為了捍衛民主政體而作出犧牲的意願上，以民主支持的態度傾向來測量的效果，會是比較合適的民主偏好測量指標。據此本文的主要假設為：

H：民主偏好越高者，越有可能具備較明顯的意願，在戰爭爆發時上戰場保衛台灣。



當然除了主要解釋防衛意願的自變項一對民主的態度以外，對於前面文獻討論過的幾個可能同樣會造成依變項影響的因素，也要被納入一併討論且在模型中控制。臺灣自身的政治脈絡也導致可能也有其他的潛在因素可能會影響到防衛臺灣的意願，同樣援引烏克蘭的案例，在有認同分歧且其中一種認同還與長期威脅本國的強鄰共享一定的歷史記憶的國度，Norris 在自己 2020 年的研究經過控制家庭使用語言後，發現俄語人口相較於烏克蘭語人口確實呈現出較低的防衛意願，類似的情況也有出現在研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俄裔族群佔總人口一定比例的國家等相關文獻中（Andžāns and Sprūds, 2020）。而臺灣社會內部也有同樣的政治生態，長期存在著在民族和政黨認同的分歧：是否視自我的身份歸屬與中國緊密不可分，以及對兩岸關係的交往方針以是否接受中共要求的九二共識。這些衍生出來的政治立場的差異長期以來一直是左右臺灣民主化後大多數選舉的重要政治議題，所以認同問題會影響到對中國該採取較為親近或疏遠的立場與否，以及決定是否展現出比較強硬或緩和的互動模式，這些差異一定程度也會是影響願不願意為了保衛臺灣而選擇挺身抵抗中國的軍事威脅的重要成因。因此本文會將民族認同與政黨認同納入模型中進行控制。除此之外，雖然從文獻回顧中可得知，過去的諸多研究針對「社會—人口」面向等影響參戰意願的效果不是相當穩定，但是本文依舊還是會在上述這些基本人口特性的變項上一併納入分析的模型中進行控制，來測量性別、教育程度、年齡以及社經地位的差異所產生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變項操作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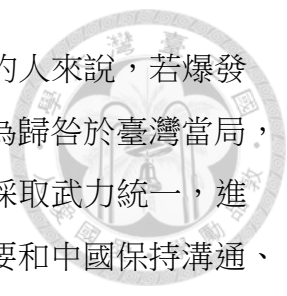


本文的研究資料選擇每年都會由「台灣民主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進行的民意調查計畫，「台灣民主價值與治理」²(Taiwan Democratic Value and Governance，以下簡稱為 TDVG)。選擇的計畫期數則以 TDVG 根據 2021 年度所做的電訪調查，經全臺灣家庭市話為母體進行隨機家戶抽樣後，電話訪問取得的問卷回答數據作為研究資料。量化的分析工具則是使用程式語言 Python 中專門用於統計分析的模組 statsmodels 來進行計量模型的運算處理。

(一) 依變項

TDVG 這份問卷另一項設計比較獨特的地方在於本文模型所要分析的依變項—「防衛意願」的問法有納入類似「條件式統獨」的因素。過去各家所做的臺灣統獨立場的民調結果，其資料都顯示出，雖然一般類似的問題受訪者的答案多數都會落在「維持現狀」的選項上，然而若是在假設宣布臺灣獨立，中國也不會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的條件下來提問，通常會發現選擇回答宣布獨立的比例會比起沒有設置此一條件前的問法來等得更高。也就是說，臺灣主流民意在統獨立場的分佈之所以集中在「維持現狀」之類的答案，背後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對於臺灣主動宣布獨立的舉動，可能就會冒著中國不得不以武力來完成統一的戰爭風險。由此可知，從長期的民調統計來看，多數臺灣人對和中國統一這件事興趣缺缺，但是論及臺灣是否該自行宣布獨立，並且也願意承擔「主動挑起」戰爭這點是存在分歧的。因此有理由可以推斷，若是兩岸發生戰事，背景條件是否為臺灣自行宣布獨立而遭致的，對

² 本文使用之調查資料全部係採自「2021 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2021 Taiwan Democratic Value and Governance)民意調查計畫，該計畫由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並釋出，計畫主持人為蔡宗漢教授。作者感謝上述單位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由作者自行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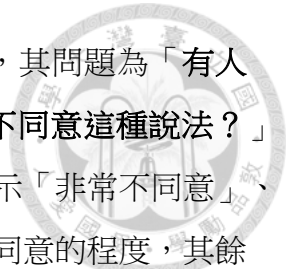
於大多數臺灣人的意義會不一樣。對於不想要「主動招惹」中國的人來說，若爆發戰爭的原因是因為臺灣宣布獨立，則「戰爭責任」就有可能被視為歸咎於臺灣當局，心理層面也可能會認為是被獨派拖下水。但是若是中國選擇主動採取武力統一，進而發動對臺灣的入侵戰爭的話，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會使得即使想要和中國保持溝通、極力避免軍事衝突的人也一同被激怒。換言之兩種不同的情境，對於臺灣人在防衛的這件事上意義就會有所不同，進而可能影響意願。

也因此這份問卷在防衛意願的題目依前提條件分成兩題，一個是「在臺灣宣佈獨立」後導致兩岸發生戰爭，問項為「**如果因為臺灣宣布獨立導致中國大陸武力攻打臺灣，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另一個則是「中國為了武統」而入侵，問題是「**如果中國大陸為了統一對臺灣使用武力，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由於兩個問題的差異只有前提條件性的不同，其答項都是由編碼數字最小的 1 至最大的 4 所組成的，代表依變項回答從「非常不願意」到「非常願意」程度的 4 分量尺，因此變數上的處理會以相同的方式進行操作。

在具體的操作方面，由於本文核心的研究假設，主要目的是在於測量自變項對於「是否」具備參戰意願，會不會影響其變化的「可能」或「機會」，因此依變項本身在模型中的性質其實會比較接近「機率」，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會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或稱「羅吉斯迴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來進行估計。根據估計方法，操作上會將兩種情境的依變項問題的回答項目中，「非常不願意」併入「不願意」，「非常願意」則併入「願意」，重新編碼成前者設置為 0 後者為 1 的兩組二分依變項，在納入自變項後，依條件的不同分別估計。

(二) 自變項與控制變項

自變項：民主偏好



TDVG 的問卷中有針對「民主偏好」個別所設計的測量問項，其問題為「有人說：『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度』，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回答項為一個 4 分量尺，分別以編碼數字由小到大排列成數字 1 表示「非常不同意」、數字 2「不同意」、數字 3「同意」、數字 4「非常同意」等 4 個同意的程度，其餘的回答項則為數字 95、96、97、98，分別表示「拒答」、「看情形」、「無意見」與「不知道」，這類回答在模型中均會設為遺漏值。該變數的操作化會將原本的量尺當作是一個由 1 至 4 分的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來進行估計。

控制變項：國族認同、政黨傾向、人口變項

繼民主的態度有關的主要自變項後，其他認同相關的變項以及基本人口屬性的變項也都要進行控制，以確保後面模型建立的解釋效果。其中國族認同與政黨認同的回答選項類型很明確為「屬質」的「類別變數」（nominal variable），和量尺的連續變數不同，其原始資料檔所顯示的回答編碼是具有特別的意義。族群認同的問題為「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臺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而回答選項中分別有「臺灣人」、「中國人」和「都是」三種回答類別，本文的模型中會將這題的回答進行重新編碼，作為一組以雙重認同「都是」的回答當成對照組的虛擬變數，其餘回答則設為遺漏值。

政黨認同的變項處理方式也類似，其問題為「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而回答則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臺聯」、「綠黨」、「時代力量」、「社民黨」、「台灣民眾黨」、「台灣基進」和其他沒有明確特定支持的回答。因為本文於政黨屬性的分析會聚焦在傳統的藍綠陣營選民的立場差異，因此人數較少的第三方勢力政黨「時代力量」與「台灣民眾黨」，處理方式會一齊和其他小黨併入「其他與中間選民」的類別。因此政黨題組經過重新編碼後，會將政黨認同的答項重新整理成「泛藍」、「泛綠」以及「其他與中間選民」等 3 種政黨支持者類型，並同樣設為以「中間選民」為對照組的一組虛擬變數。

基本人口屬性的變項主要用於控制前面文獻中「社會—人口」面向的因素本身對依變項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這份問卷中有明確針對年齡以及教育程度所進行調查，唯獨在社經地位方面，TDVG 的題組中沒有像其他前面文獻所使用的調查資料選擇收入級距作為測量的指標，當中只有詢問受訪者的職業類別可能會和社經地位比較有關，因此本文的模型中選擇職業類別作為表示社經地位的替代選項。而這樣做也有其他分析上的益處，像是對於不同職業型態的所得來源本身可能有所不同，進而對於經濟因素造成的問題也會有其他考量，這些經濟條件的異質性往往也無法由一般的收入調查來觀察。關於資料處理的方式，本文則會將依據原始問卷對三個題組的設計，將年齡和教育程度的題組設成連續變數，因為年齡層與學歷的差異都具有順序的級距差異；職業類別則是以是否為「高、中級白領」作為區分基準，將「中、低級白領」、「農林漁牧」和「藍領」等屬於非主管級的職業重一同新編碼成「非高、中級白領」的類別，並以此為對照組控制處於管理職地位的效果。除此之外，性別因素也是多數社會科學研究都會進行控制的變項，本文參考以往文獻的普遍做法，將女性設為對照組，比較男性的虛擬變數。

第三節 模型設計與預期效果

基於前述對於變項的操作處理方式，本文以「民主偏好」*Pre* 作為主要的自變項，代表對民主制度偏好程度的主要指標，並在控制「國族認同」*Tw&Cnid* 與「政黨認同」*Partyid* 等重要的變項和「人口基本特徵」 $f(X_i)$ 後，根據依變項「參戰意願」（*Wil*）分別在（一）台灣宣布獨立（Taiwan declaring independence）時 Wil_{TD} 和（二）中國武統（China invading Taiwan）時 Wil_{CI} 等戰爭情境條件，都各自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或稱「羅吉斯迴歸模型」）來估計。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兩組模型：

Modell:

$$Wil_{TD} = \beta_0 + \beta_1 \times Pre + \beta_2 \times Partyid + \beta_3 \times Tw\&Cnid + f(X_i) + \varepsilon$$



Model2:

$$Wil_{CI} = \beta_0 + \beta_1 \times Pre + \beta_2 \times Partyid + \beta_3 \times Tw\&Cnid + f(X_i) + \varepsilon$$

本文依據前面文獻和既有理論的討論基礎，預期自變項 *Pre* 的效果會於模型中會和依變數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因此推估其迴歸係數 β_1 的值會大於 0；以此類推另一個自變項 *Pow* 則的回歸係數 β_2 應該也會小於 0。而 *Partyid* 和 *Tw&Cnid* 這兩個控制變項在操作的處理上因為皆為兩組該類別屬性編碼而成的虛擬變項，因此得進一步區分其細部的效果。*Partyid* 以「其他和中間選民」作為對照組，因此被納入模型中進行估計的有「泛綠」 (*Partyid_{pangreen}*) 和「泛藍」 (*Partyid_{panblue}*) 這兩個虛擬子變項，其實際在模型中的估計本文以 $\beta_{2.1} \times Partyid_{pangreen} + \beta_{2.2} \times Partyid_{panblue}$ 來表示。當中 $\beta_{2.1}$ 為「泛綠」支持者的迴歸係數，而 $\beta_{2.2}$ 則是「泛藍」支持者的迴歸係數。根據既有的理論，政黨傾向較為偏綠營的選民，可能會比起強調「和中」政策的藍營選民對於以軍事行動保衛台灣有較高意願，因此其預期效果應該會出現 $\beta_{2.1} > 0$ 而 $\beta_{2.2} < 0$ 的結果。*Tw&Cnid* 則是以「台灣人和中國人都是」的「雙重認同」作為對照組，個別估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Tw&Cnid_{CN}*) 和「台灣人」 (*Tw&Cnid_{TW}*) 這兩個虛擬變項的效果，在模型中以估計式 $\beta_{3.1} \times Tw\&Cnid_{CN} + \beta_{3.2} \times Tw\&Cnid_{TW}$ 來表示。以台灣實際的政治分歧脈絡而言，對國族認同的因素，可以預期迴歸係數值會有 $\beta_{3.1} < 0$ ，以及 $\beta_{3.2} > 0$ 的結果。*f(X_i)* 則是基本人口變項，包含性別 (*Sex*)、年齡 (*Age*)、教育程度 (*Edu*) 和職業 (*Career*)，主要是控制前述理性選擇導向的因素對依變項的效果，然而根據文獻回顧的研究成果，除了性別因素外，其餘人口變項的預期效果可能不並穩定。



第肆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

(一) 參戰意願

從 TDVG 的資料呈現來看，可以發現根據 2021 的民意調查結果，在參戰意願方面，當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時，在原資料問卷中「**如果因為臺灣宣布獨立導致中國大陸武力攻打臺灣，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這題的問題的回答中，主觀上表達願意，即「非常願意」加上「願意」，如表 4-1 所示，其比例約有 62.66%，而表達不願意者，「非常不願意」加上「不願意後」後的比例約為 27.72%。這說明在戰爭情境為台獨時，總體來說「願意」參戰的人比例有高過 6 成。而當戰爭情境變成是「中國武統」時，在原資料問卷中「**如果中國大陸為了統一對臺灣使用武力，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這題問題的各回答項同樣以「非常願意」加上「願意」以及「非常不願意」加上「不願意」來合併作為其參戰意願表達後，如表 4-2 所示，大致上表達「願意」參戰者的比例高達約 72.6%，而「願意」者的比例僅有約 18.86%。這顯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確實都有高過一半比例的台灣人具備參與保衛台灣作戰的意願，不過同時也透露不同的戰爭情境對於人們的參戰意願確實有一些影響。當情境從「宣布台獨」換成「中國武統」時，願意參戰者的比例就高達 7 成，比起「宣布台獨」時還多了將近 1 成的比例，而不願意參戰者，也從原先超過 4 分之一而接近 3 成的比例，降到了不足 2 成。



表 4-1 參戰意願 (台獨)

	次數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220	16.94%
不願意	140	10.78%
願意	383	29.48%
非常願意	431	33.18%
無反應	125	9.62%
Total	1299	100.00%

資料來源：TDVG (2021)

表 4-2 參戰意願 (武統)

	次數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142	10.93%
不願意	103	7.93%
願意	428	32.95%
非常願意	515	39.65%
無反應	111	8.55%
Total	1299	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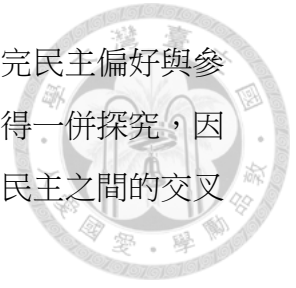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DVG (2021)

(二) 民主偏好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在初步分析完依變項的資料結構後，接著藉由檢視自變項和其餘控制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分佈情形，來初步探究民主制度的偏好與參戰意願高低的表達呈現什麼樣的關係。針對 TDVG 的這份調查資料的操作，在依變項參戰意願方面，為了比較具體地觀察、描述「願意」以及「不願意」這兩種回答的差異，因此本文延續前一節在兩種情境底下的參戰意願的次數分配表中對依變項的觀察操作方式，將表達程度強烈的「非常願意」和「非常不願意」這兩種回答一律與「願意」和「不願意」合併，以拉開並凸顯樣本在回答「願意」、「不願意」上的差距。出於類似的緣由，下列自變項民主偏好的答項也以同樣的操作方式，將原問卷中「有人說：『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度』，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該題組回答中「非常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兩種答案分別併入「同意」與「不同意」的回答類別中，並且對受訪者的參戰意願和民主偏好程度分別進行交叉分析。

當戰爭爆發情境為「宣布台獨」時，其參戰意願與民主偏好的交叉分析表的結果如表 4-3 所示，可以發現在「宣布台獨」情況下，在「民主偏好」的問項上，回答為「不同意」者中，在參戰意願的回答上，表達「願意」上戰場的人比例約有 51.06%，而「不願意」上戰場的比例則有約 41.49%。從大致上來看，即使是「民主偏好」的表達上較低的人，其參戰意願也不算太低，不過同時明確表示「不願意」參戰的人也有超過 4 成。而在「民主偏好」的問項上，回答「同意」者，其在參戰意願的回答中，表達「願意」上戰場的人比例達到 67.36%，而「不願意」上戰場的比例則是約為 25.10%。也就是說，「願意」參戰的人在「民主偏好」較高者身上，其比例突破了 6 成，而同時表達「不願意」參戰的人比例也下降到了約為四分之一左右。這個結果結合前面民主偏好回答為「不同意」者的參戰意願分佈情況來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民主偏好」對「參戰意願」的影響從初步的分析來看，雖然資料結果呈現無論民主偏好程度高（「同意」者）或低（「不同意」者）的類別中，願意參戰的比例本身就都已經超過一半，不過確實依舊具有正面提升的效果。當民主偏好由「不同意」變成「同意」時，一方面既相應地增加了「願意」參戰的人的比



例，同時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表達「不願意」比例。不過在初步討論完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之間的關聯性後，還有不同的戰爭情境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得一併探究，因此以下也將檢視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依變項參戰意願與主要自變項民主之間的交叉分析效果為何，是否有出現相似的結果，抑或是有所差異。

表 4-3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民主偏好	參戰意願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不同意	41.49%	51.06%	7.45%	100.00%
同意	25.10%	67.36%	7.54%	100.00%
無反應	28.16%	37.86%	33.98%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若將戰爭情境換成中國「武統入侵」時，會得出其參戰意願與民主偏好的交叉分析如表 4-4 所示，可以發現在民主偏好的問題上回答為「不同意」者，同時回答「願意」參戰的人，其比例約有 61.70%，而「不願意」參戰的比例則有 29.26%。而在民主偏好的問題上回答「同意」者，則約有 76.79% 的比例同樣選擇「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不願意」者的比例則有 16.96%。這樣的數據意味著，在民主偏好為「不同意」的回答類別中，「願意」參戰的比例約只有 6 成左右，比起民主偏好為「同意」者回答「願意」的比例突破 7 成而言，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這也初步說明了在「武統」的情境底下，對民主偏好的程度極有可能和參戰意願的回答存在某種正向的關聯性，而這個資料結果也與「台獨」的情境底下如出一轍。

就表現面上來看，正面支持民主制度和表達願意參戰的相關效果在任何一種情境底下都獲得支持這一點，可以說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之間的關係大致上並不會因為情境的不同從而出現顯著的差異，因此目前可暫且推論戰爭情境本身的效果應該

不會太過強烈以至於扭轉根本的相關性。不過如果將兩種不同情境的資料結果相互比對的話，還是可以在兩份交叉分析表中的資料分佈狀況看出些許差異，尤其是參戰意願中回答「願意」的比例在不同的表中會有所變化。當戰爭情境從「台獨」變成「武統」時，在參戰意願的問項回答「願意」的比例也會相應增加，而且這種增加的效果無論民主偏好的回答是「同意」或「不同意」的類別都有出現。就這個現象進行解讀的話，可以據此推測戰爭情境或多或少應該還是會對於人們的參戰意願有所影響，只不過可能在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的關係中情境變化不夠成根本的影響。然而單就資料結果來看，還是可以歸納得出，當戰爭情境由「台獨」變成「武統」時，人們的參戰意願會有所提升。如此一來，在模型中主要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已初步完成，其餘在也一併被納入模型中進行分析的控制變項在前述章節檢閱文獻時，也提及可能也會對於依變項有影響，因此後續本文也會進一步檢視政黨認同、國族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等控制變項個別與參戰意願交叉形成的分佈效果。

表 4-4 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民主偏好	參戰意願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不同意	29.26%	61.70%	9.04%	100.00%
同意	16.96%	76.79%	6.25%	100.00%
無反應	18.45%	51.46%	30.10%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三)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政黨認同」和「國族認同」在本文的模型中分別是兩個相當重要的控制變項，在理論假設的章節中已經提及這兩項因素之於台灣的政治議題的影響程度，因此在此處也必須納入和依變項參戰意願進行初步的交叉分析中。首先關於「政黨認同」的部分，在戰爭情境為「宣布台獨」導致戰爭發生時，其變項中各個回答類別與參戰意願交叉後所形成的分佈情形，如表 4-5 所示，「政黨認同」的各個答項中，回答為「泛綠」的支持者，有高達約 92.9% 比例的受訪者同時表達出「願意」參戰，而表達「不願意」的比例則有約 4.26%；而在「泛藍」支持者中，參戰意願的問題回答「願意」參戰的比例約為 36.12%，「不願意」者的比例則有 57.17%；「中間選民」針對參戰意願的回答部分，則有約 56.25% 的比例表達「願意」參戰，選擇回答「不願意」者的比例約有 29.86%。

就該結果而言，在戰爭的起因是「台獨」引起的情況下，其參戰意願的回答在各類政黨認同的分佈狀況為，「泛綠」的支持者會有最高突破 9 成的比例回答「願意」，而且「無反應」和「不願意」的回答比例都是最低的，只有個位數而已；「泛藍」的支持者中，回答的分佈則是有過半比例表達「不願意」參戰，而其回答「願意」者的比例也是在三種政黨認同的類別中最低的，只有約略超過三分之一；而「中間選民」的參戰意願回答則是恰好介於「泛綠」與「泛藍」兩種認同的中間，回答「願意」參戰的比例剛好超過一半，而回答「不願意」者的比例也低於 3 成，不過回答「無反應」的比例卻是三種政黨認同中最高的，有超過 1 成。若是把三組參戰意願的回答，依據「願意」的高低遞減或是「不願意」的高低遞增來排列，可以得出一種「泛綠—中間選民—泛藍」的排序組合。這個資料結果所呈現的排列方式，正好符合台灣傳統兩大政黨在統獨和兩岸政策等議題上的政治光譜，因此這個結果或許能作為說明台灣人對於參戰意願的態度可能和傳統兩大政黨的政治立場息息相關的初步證據，因而政黨認同的因素可能會對於依變項參戰意願有影響。為了檢驗上述的資料分佈結果是否是「戰爭情境限定」，以下也會檢視「武統」情境底下的參戰意願回答分佈情況。



表 4-5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	參戰意願（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泛綠	4.26%	92.90%	2.84%	100.00%
泛藍	57.27%	36.12%	6.61%	100.00%
中間選民	29.86%	56.25%	13.89%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若是戰爭的起因換成是出於中國想要「武力統一」台灣而主動入侵時，在「政黨認同」的參戰意願回答分佈上，其交叉分析表會如表 4-6 所示，政黨認同的類別為「泛綠」支持者中，在參戰意願的問題回答「願意」參戰的比例約為 94.6%，「不願意」者的比例則有約 3.69%；在「泛藍」支持者中，回答「願意」參戰的比例則有約 55.51%，回答「不願意」參戰的比例約為；而「中間選民」表達「願意」參戰的比例則為約 67.22%，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是約有 19.27%。

這個資料的分佈情形顯示了，在戰爭情境為「武統」的情況下，政黨認同對於參戰意願的回答會呈現出，「泛綠」支持者有高達 9 成以上的比例回答「願意」，高居三種政黨認同類別之首，而其回答「不願意」的比例也同樣是最低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四；「泛藍」支持者則是呈現幾乎相反的情況，其在參戰意願上回答「願意」的比例是最低的，只有 5 成左右，而「不願意」的回答比例也是三者中最高的，有將近 4 成；「中間選民」的回答，除了「無反應」是三種政黨認同中最多的以外，無論是「願意」或「不願意」的比例剛好都居於另外兩者之間，分別是超過 6 成比例的「願意」，以及不到 2 成的「不願意」。而上述的分佈情形，也都呈現出前面提及的「泛綠—中間選民—泛藍」的排序方式，也就是可能作為支持政黨認同的確是影響參戰意願的有效控制變項的初步證據跡象，而這些結果也都符合前述段落中針對「台獨」情境底下所做出來的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之間的交叉分析結果。

基於任何一種情境都出現了不完全一致，但大體上都相似的資料結果，因而可以據此推論，台灣傳統藍綠兩黨的政治立場差異，對於依變項參戰意願有著「跨戰爭情境」的共通影響效果，其本身的作用不局限於特定戰爭情境。但若是同樣將兩種情境的個別數據進行對照、相互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哪種政黨認同的類別，在回答有關參戰意願的問題時，皆會有出現相較於「台獨」，「武統」的情境底下回答「願意」者的比例會明顯增加或是回答「不願意」者的比例明顯降低的情況。因此藉由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中可以再一次得出，戰爭情境差異本身造成的影響效果應該是，當中國為了統一而採取軍事行動會刺激台灣人更強的抵抗心理，導致參戰意願比起戰爭起因為台灣宣布獨立時還來得更高。而這個推測本文將繼續在以下「國族認同」和基本人口變項對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中，再次進一步一同檢視。

表 4-6 政黨認同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泛綠	3.69%	94.60%	1.70%	100.00%
泛藍	39.65%	55.51%	4.85%	100.00%
中間選民	19.72%	67.22%	13.06%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四)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作為長久以來社會內部本身就存在著認同分歧的國度，「國族認同」的問題同樣也是台灣政治中從不缺席的重要角色，在方方面面影響許多政治議題，也因此回顧過往文獻時，可以發現到針對大部分的台灣政治問題的研究都必須考量到其構成影響的因素，這也是繼「政黨認同」後本文必須將其一併列入作為控制變項的原因。為處理「國族認同」是否為會明顯影響到台灣人有關參戰意願回答的重要因素，與前文作法類似，先進行初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國族認同」與不同情境的參戰意願回答所形成的交叉分析，觀察各種「國族認同」類別在參戰意願回答上的分佈情形。首先在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所引發戰火的背景下，「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表會如表 4-7 所示，可以看到根據得到的數據顯示，在參戰意願的回答上，「國族認同」方面自認為「中國人」者，約有 30.43% 的比例回答「願意」參戰，回答「不願意」者在之中則約有 63.04%；自認是「台灣人」的人之中，則有約 79.36% 的比例在參戰意願的問題上回答「願意」，「不願意」者的比例則約有 13.4%；而自認台灣人和中國人「都是」的人，當中則有約 43.39% 比例的人回答「願意」參戰，而回答「不願意」者的比例則約為 46.92%。

這個資料結果說明，在「台獨」的戰爭情境底下，各種「國族認同」的類別在回答參戰意願的問題時，「中國人」的認同有著比起其他兩種主要的國族認同身份類別而言，算是最底的參戰意願，其回答「願意」的比例只有約略 3 成出頭，而「不願意」的回答比例則高達 6 成以上，甚至在表列出來的全部四種認同（三種主要的認同：「中國人」、「台灣人」、「都是」，加上「其他」）類別中也是最高的；「台灣人」認同則就和「中國人」的分佈情況相左，在參戰意願的問題回答「願意」者的比例是三種主要國族認同類別中最高的，將近快要 8 成，而「不願意」者的比例僅僅約只有超過 1 成多一點而已；雙重身份認同「都是」的參戰意願回答情況在三者之中，則是「不願意」和「願意」的比例都各佔了 4 成多左右，因此其參戰意願的高低正好介於另外兩種的「國族認同」類別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若是根據參戰意願回答的分佈情況，以「願意」由低至高升冪或是以「不願意」由高至低降冪來排序，可以得出「中國人—都是一台灣人」的排序組合。而這個分佈情況正好幾乎符合台灣政治生態中，和認同分歧與統獨問題、兩岸關係立場差異的政治光譜相疊合的狀態：越往左則對於中國越親和友好，甚至是希望和中國統一，越往右則重視本土文化，往往也傾向台灣獨立。這也同時意味著，這個目前的資料結果暫且能夠初步說明，台灣人有關參戰意願的態度，和「國族認同」本身可能確實有著不小的相關性，否則不會在各項「國族認同」類別之間出現這麼明顯的回答異質性，且答項的分佈情形還與國家命運或是兩岸政策相關的政治光譜如此高度吻合的現象。為了要控制戰爭情境差異本身的影響，以下同樣也會再次針對「武統」時的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來檢視上述結果是否為「戰爭情境限定」。

表 4-7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國族認同	參戰意願（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中國人	63.04%	30.43%	6.52%	100.00%
都是	46.92%	43.39%	9.69%	100.00%
台灣人	13.40%	79.36%	7.24%	100.00%
其他	33.96%	20.75%	45.28%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當爆發戰爭的背景變成是由於中國為了「武力統一」而入侵台灣時，「國族認同」中各類別在參戰意願問題上的回答分佈情況，其交叉分析結果就會如表 4-8 所示，可以發現自認自己的國族身份為「中國人」者，其參戰意願的回答中，「願

意」的比例約有 39.13%，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是約有 50%；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者，在該問題的回答則是，表達「願意」的比例約有 85.79%，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8.98%；自認具備雙重身份認同「都是」的人中，在參戰意願的回答為「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59.25%，而「不願意」者的比例則約為 31.94%。

這份數據顯示了在「武統」的戰爭情境底下，三種主要的「國族認同」類別在參戰意願回答方面的分佈情況大致會呈現出，「中國人」認同具有最低的「願意」參戰比例，約只有將近但不到 4 成，與最高的「不願意」比例，恰好佔了一半；「台灣人」認同則出現完全相反的情況，有著極高的比例回答了「願意」，高達 8 成以上，同時回答「不願意」的比例亦是最底的，只有不到 1 成而已；「都是」的類別在回答結果則一樣為介於兩者之間，回答「願意」的比例接近 6 成，而「不願意」的比例則是約略超出 3 成一點。這個資料的分佈結果綜合來看，也同樣出現了如同前面「台獨」情境時，各項國族認同類別的參戰意願高低排序方式，無論是以「願意」或「不願意」來排列，皆會得出一個和統獨議題與對兩岸關係立場的政治光譜落點相近似的分佈現象。

就和先前出現一致的結果這點而言，可以初步說明，不僅國族認同的差異確實可能會是影響依變項參戰意願高低的重要因素，而且其效果也不會因戰爭情境的不同而有根本性的變化。然而，兩種情境底下所產生的兩份資料數據依舊存在些許差異，為了確定戰爭情境差異本身對於參戰意願的確切影響為何，在將兩份資料結果進行對照比較後，就會發現，相較於戰爭情境為「台獨」時的參戰意願回答情形，三種主要的「國族認同」類別在「武統」底下回答「願意」的比例都有為幅度的增加，同時「不願意」的回答比例也有些微降低。因此根據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在兩種情境底下的對比，一樣可以推測人們在「武統」的戰爭情境底下會比起「台獨」時具有比較高的參戰意願。

至此，在模型中原先被假設對依變項會有影響的主要變項皆已完成初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而為求更整全地理清所有變項的資料性質，以下將會繼續檢視基本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社經地位）」，其個別的差異是否同樣會對參戰意願造成影響。



表 4-8 國族認同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國族認同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中國人	50.00%	39.13%	10.87%	100.00%
都是	31.94%	59.25%	8.81%	100.00%
台灣人	8.98%	85.79%	5.23%	100.00%
其他	18.87%	30.19%	50.94%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五）性別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性別差異在回答參戰意願相關問題的情況，首先觀察在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時，其回答的分佈會如表 4-9 所示，「女性」在參戰意願上回答「願意」的比例約有 58.29%，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為 30.81%；「男性」方面的回答情況則是，表達「願意」參戰的比例約有 66.82%，而「不願意」者的比例則是約有 24.77%。男性回答「願意」的比例突破 6 成，而「女性」相較之下只有接近但沒有超過 6 成，而「不願意」的回答方面，「女性」的比例就有 3 成左右，「男性」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從這個結果來看，無論是在「願意」或「不願意」的回答比例上的比較，男性應該都比起女性有更高的參戰意願，雖然差異幅度不算太大。



表 4-9 性別與參戰意願（台獨）的交叉分析表

性別	參戰意願（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女性	30.81%	58.29%	10.90%	100.00%
男性	24.77%	66.82%	8.41%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分析完「台獨」情境的資料分佈後，接著繼續檢視「武統」時的數據情況，會得到如表 4-10 所示的結果，在有關參戰意願的回答方面，「女性」約有 68.09% 的比例回答「願意」，而回答「不願意」22.27%；「男性」則是回答「願意」的比例約有 76.88%，而「不願意」的比例則有約 15.62%。相較於「女性」不到 7 成的比例回答「願意」，「男性」則是超過 7 成，而「不願意」的回答上，「女性」有高達 2 成的比例也多過「男性」只有不到 2 成的比例。換言之這個資料結果依舊顯示出「男性」相較於「女性」有更高的參戰意願，雖然差異的幅度同樣並非極度懸殊。因此，從性別差異對參戰意願的回答分佈情況來看，性別因素這個人口屬性變項本身確實可能會對依變項參戰意願造成影響，且效果是不分戰爭情境的。而若是將兩種不同情境底下所產生的資料數據進行相互對比，則可以發現，相較於「台獨」，在「武統」的情境底下，「男性」與「女性」的參戰意願表達都會比較高。其變化如下，「女性」回答「願意」的比例由接近 6 成提升至接近 7 成，而「男性」回答「願意」的比例也由 6 成多提升至 7 成多，兩者分別都提升約有 10% 左右的幅度。根據這個增幅的變化結果，同樣可以推測戰爭情境為「武統」的情況下，可能會刺激台灣人，比起在「台獨」的情境時，表現出更高的參戰意願。



表 4-10 性別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性別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女性	22.27%	68.09%	9.64%	100.00%
男性	15.62%	76.88%	7.51%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六）年齡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年齡差異對於回答參戰意願問題的分佈影響，在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所開啟戰端的背景下，會呈現如表 4-11 所示的結果，有關參戰意願的回答方面，在各個年齡層的組別的情形為，「20 至 29 歲」約有 70.89% 比例的人回答「願意」，而「不願意」的比例約有 24.68%；「30 至 39 歲」則是回答約有 72.54% 的比例回答「願意」，「不願意」的比例約為 22.28%；「40 至 49 歲」在回答「願意」的比例上約有 67.42%，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24.72%；「50 至 59 歲」這個區間的人則有約 63.32% 的比例回答「願意」，「不願意」者的比例則是約為 30.12%；「60 歲以上」的人回答「願意」的比例則有約 52.13%，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32.72%。

就上述這個參戰意願回答的分佈數據來看，這份資料顯示了較為年長者的族群確實可能比起年輕族群，在參與作戰的意願上來得更低。在比較青壯年的族群中，如「20 至 29 歲」和「30 至 39 歲」這兩個年齡層中，回答「願意」的比例皆有超過 7 成左右，而在中年齡層的「40 至 49 歲」和「50 至 59 歲」中，回答「願意」的比

例就跌落至 6 成多了，而該比例來到最年長的年齡層「60 歲以上」的人時，就已經只剩下 5 成出頭左右而已。

大致上，參戰意願的回答分佈有著年齡增長，而其意願會逆向降低的趨勢，但就資料結構而言，實際上回答「願意」比例的最高峰值是落在第二個年齡層「30 至 39 歲」的組別，加上除了「60 歲以上」的「願意」回答比例特別低之外，其餘年齡層之間的答案比例其實相近不少而下降幅度也並不算太多，皆在 10% 以內，這些資料特性導致了年齡的增長和參戰意願之間，並非呈現出完全典型的「線性遞減」關係。這個現象也呼應了前面章節回顧文獻時，有提及年齡因素在分析參戰意願時會有不穩定的效果，在不同的研究個案中，參戰意願的最高組別會落在任一的年齡層皆有可能，從而無法得出一致的線性關係，無論是正向或是負向。因此從目前的資料結果來說，論及台灣人的參戰意願時，只能保守地看出最年長的年齡層，會比起其他相較年輕的年齡層組別，具備較低的參戰意願，但無法斷言這種因年齡層差異所生的變化是線性遞減的。以下則將會繼續檢視這種不穩定的效果是否會受到戰爭情境差異的影響，而導致分佈情況有所不同。



表 4-11 年齡與參戰意願 (台獨) 的交叉分析表

年齡	參戰意願 (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二十至二十九歲	24.68%	70.89%	4.43%	100.00%
三十至三十九歲	22.28%	72.54%	5.18%	100.00%
四十至四十九歲	24.72%	67.42%	7.87%	100.00%
五十至五十九歲	30.12%	63.32%	6.56%	100.00%
六十歲以上	32.83%	52.13%	15.04%	100.00%
無反應	13.04%	43.48%	43.48%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 (2021)

當戰爭的爆發條件從「台獨」變成「武統」時，年齡層差異對於回答參戰意願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其回答的分佈會如表 4-12 所示，「20 至 29 歲」回答「願意」的比例約有 79.11%，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是約有 17.72%；「30 至 39 歲」則有 82.38% 的比例回答「願意」，而「不願意」的比例約有 15.03%；「40 至 49 歲」在回答意願的比例上分別為「願意」約有 77.53%，而「不願意」則約有 16.48%；「50 至 59 歲」回答「願意」的比例約有 76.06%，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為；「60 歲以上」則是有約 61.15% 的比例回答「願意」，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23.81%。

這個資料結果顯示了具備最高的參戰意願的組別依然落在了「30 至 39 歲」這個年齡層，回答「願意」的比例高達了 8 以上，而最年長的「60 歲以上」者也同樣在全部年齡層中參戰意願是最低的，只有 6 成出頭左右的「願意」回答比例，兩者差距幾乎是 20% 左右。而除了「60 歲以上」以外，其餘年齡層各組的差異在這份資料

的分佈狀況也不算太大，甚至比起「台獨」的情境時，還有些微拉近。因此就出現峰值的組別落點、最低參戰意願的組別落點，以及非「60歲以上」的年齡層差距相近這幾個特性而言，對照「台獨」情境底下的資料，在「武統」時也出現了幾乎近似的結果。據此，可以類推較年輕的年齡層會比最年長的年齡層具備更高的參戰意願，這個年齡差異對參戰意願造成的效果應該是成立的，只是這份資料同樣顯示年齡因素與依變項參戰意願兩者之間沒有具備很典型的「線性關係」。而戰爭情境差異的影響，藉由對比兩份資料在各個年齡層回答「願意」的分佈比例來觀察，可以發現當情境由「台獨」變成「武統」時，在各個年齡層中回答「願意」的比例皆出現了幅度不一的提升，所以這個現象又再一次證明，台灣人在「武統」的情境底下，確實可能比「台獨」時具備更高的參戰意願。

表 4-12 年齡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年齡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二十至二十九歲	17.72%	79.11%	3.16%	100.00%
三十至三十九歲	15.03%	82.38%	2.59%	100.00%
四十至四十九歲	16.48%	77.53%	5.99%	100.00%
五十至五十九歲	17.37%	76.06%	6.56%	100.00%
六十歲以上	23.81%	61.15%	15.04%	100.00%
無反應	17.39%	47.83%	34.78%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七)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對於特定社會現象的影響也是社會科學中經常被探討的議題，本文以 TDVG 的問卷資料當中針對台灣所列的學位制度作為測量的基準，觀察五種由初等至高等教育層級的學歷，各自在參戰意願問題上的回答分佈情況。在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所引起的背景下，其資料結果會如表 4-13 所示，「小學及以下」的學歷中，約有 44.57% 的比例回答「願意」，「不願意」的比例約為 27.17%；「國、初中」則約有 61.95% 的比例回答「願意」，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22.12%；「高中、職」回答「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66.95%，而「不願意」的比例則約為 25%；「專科」方面則有約 58.43% 的比例回答「願意」，「不願意」者約佔了 34.83%；而「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約有 65.17% 的比例回答了「願意」，而「不願意」的比例則是約有 28.19%。

在這份資料呈現的數據中，最初等層級的學歷「小學及以下」約只有 4 成左右，比起其他學歷都有接近 6 成或是突破 6 成的情形來說，其「願意」的回答比例明顯是最低的，且與其他學歷組別的比例差異最為懸殊，然而教育程度在回答參戰意願問題的分佈上出現了類似年齡的「非線性關係」。一開始從「小學及以下」到「高中、職」這三組學歷之間，確實呈現比例逐步增加的情況，從 4 成來到了 6 成以上，但是到了「專科」的比例又降至只有 5 成多接近 6 成而已，直到「大學及以上」才又回到 6 成多。亦即雖然大致上可以得出受過較高等層級教育的人，比起只有最初等學歷者，會具備更高的參戰意願，不過回答「願意」的比例並非隨著年齡逐步提升而同時遞增。



表 4-13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 (台獨) 的交叉分析表

教育程度	參戰意願 (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小學及以下	27.17%	44.57%	28.26%	100.00%
國、初中	22.12%	61.95%	15.93%	100.00%
高中、職	25.00%	66.23%	8.77%	100.00%
專科	34.83%	58.43%	6.74%	100.00%
大學及以上	28.19%	65.17%	6.63%	100.00%
無反應	20.00%	40.00%	40.00%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 (2021)

當戰爭情境換成中國為追求「武力統一」，而主動挑起戰端時，教育程度對參戰意願回答分佈的影響，會如表 4-14 所示，「小學及以下」回答「願意」的比例約有 50%，「不願意」約有 22.83%；「國、初中」約有 74.34%的比例回答「願意」，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12.39%；「高中、職」回答「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75.32%，而「不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17.86%；「專科」回答「願意」的比例約為 70.79%，而回答「不願意」的比例則約為 24.72%；「大學及以上」的人，回答「願意」的比例則約有 75.32%。

這份資料的數據顯示了，「小學及以下」這個學歷的組別中，回答「願意」的比例不僅是最低的，只有剛好 5 成左右，且比起其他受過更高層級學歷的人，其比例差異還特別懸殊，其他學歷的組別在回答「願意」的比例上都落在 7 成左右，也就是說最初等學歷的族群和其他人的參戰意願比例相差將近 20% 以上。而這個結果正好符合了在「台獨」情境時，最低參戰意願的落點組別，因此推論其他受過比起

最初等學歷還要更高層級教育的人，可能會比只有最初等學歷者有更高的參戰意願，這個論點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且有效性不受「戰爭情境限定」的影響。除此之外，在「武統」情境底下的資料中，這 5 組學歷的回答分佈，也有呈現出如前述一樣的「非線性關係」的現象。從「小學及以下」最低的比例 5 成，到「高中、職」的比例是本資料中的層峰數值，這之間的變化是遞增的，但中間「專科」的比例又出現些微下降，直到最後面「大學及以上」的比例才又再次增加。戰爭情境的影響則透過對比兩份資料，可以發現各個學歷組別的「願意」比例，從「台獨」換成「武統」時，皆有出現提升的變化，因此再一次佐證台灣人在「武統」的情境底下，比起「台獨」可能確實會有更高的參戰意願。

表 4-14 教育程度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教育程度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小學及以下	22.83%	50.00%	27.17%	100.00%
國、初中	12.39%	74.34%	13.27%	100.00%
高中、職	17.86%	75.32%	6.82%	100.00%
專科	24.72%	70.79%	4.49%	100.00%
大學及以上	18.41%	75.29%	6.30%	100.00%
無反應	0.00%	20.00%	80.00%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八) 職業與參戰意願的交叉分析表

職業這個變項在前面研究設計時已經提及，主要是為了控制社經地位因素可能會造成對參戰意願回答的影響，而職業差異在參戰意願問題上的回答情況，若是在戰爭情境為「台獨」時，會如表 4-15 所示，「高、中級白領」的回答，分別為約有 62.79% 的「願意」，以及 28.45% 的「不願意」；「非高、中級白領」則是約有 63.84% 回答「願意」，而「不願意」的比例約有 27.38%。

從數據上看來，兩種職業類別在「願意」和「不願意」的回答方面，比例都很接近，都是分別為 6 成的「願意」與接近 3 成的 2 成多的「不願意」，也因為回答的分佈特徵上沒有出現很明顯的差異，所以應該能以此推論職業差異本身可能與參戰意願沒有什麼特殊關聯性。

表 4-15 職業與參戰意願 (台獨) 的交叉分析表

職業	參戰意願 (台獨)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高、中級白領	28.45%	62.79%	8.75%	100.00%
非高、中級白領	27.38%	63.84%	8.77%	100.00%
無反應、其他	22.73%	43.18%	34.09%	100.00%
Total	27.71%	62.66%	9.62%	100.00%

資料來源：TDVG (2021)

在觀察完「台獨」時的資料結果後，「武統」情境的數據也要一併檢視以確認情境本身是否有所影響。當依變項的戰爭情境變成「武統」以後，職業差異在參戰意願的回答分佈，就會如表 4-16 所示，其回答情況為，「高、中級白領」分別約有 72.05% 比例的「願意」和 20.54% 的「不願意」，而「非高、中級白領」則是分別有

74.74%的「願意」和 17.55%比例的「不願意」。可以發現，兩種職業類別在這份資料中依舊維持了相差無幾的回答「願意」的比例，兩者皆有 7 成多的比例。因此，即使在不同的戰爭情境下，職業類別差異依然沒有造成在回答參戰意願時，有明顯的不同，這一點算是再一次驗證了職業差異可能並非會顯著影響參戰意願的因素。另一方面，同樣將兩種情境的資料進行比對，當戰爭情境由「台獨」變成「武統」時，兩種職業類別回答「願意」的比例皆從 6 成提升至 7 成，所以這一現象又再一次證明台灣人在「武統」的情境下，確實會比「台獨」具備更高的參戰意願。這也意味著，若是中國主動挑起戰火，可能會激起更多台灣人的抵抗意志。

表 4-16 職業與參戰意願（武統）的交叉分析表

職業	參戰意願（武統）			Total
	不願意	願意	無反應	
高、中級白領	20.54%	72.05%	7.41%	100.00%
非高、中級白領	17.55%	74.74%	7.72%	100.00%
無反應、其他	15.91%	47.73%	36.36%	100.00%
Total	18.86%	72.59%	8.55%	100.00%

資料來源：TDVG（2021）

第二節 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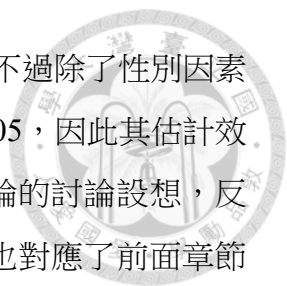


(一) 台灣宣布獨立時的參戰意願

在研究假設 H 中，本文假設民主偏好的態度傾向越高，對於保衛台灣上戰場的參戰意願也會相應較高，透過已經預設好戰爭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而爆發時的條件下，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 4-17 所示。從迴歸模型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民主偏好的迴歸係數為 0.3810，這是一個大於 0 的正數，這意味著民主偏好和參戰意願確實在本模型中是呈現正相關的關聯性，而且民主偏好的顯著值 p-value 為 0.000，是一個小於 0.05 的數值，這個情況說明，H 的對立假設在本次的研究中可以成立。換言之，就統計學的意義而言，民主偏好越高，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也會越高的假設，在這份資料所分析出來的結果中，被驗證為真且穩定性是足以支持的。

除此之外，在控制變項的結果方面，首先國族認同中，「中國人」的迴歸係數為 -0.5839，是一個小於 0 的負數，而「台灣人」的迴歸係數則為 1.2516，為一個大於 0 的正數，因此這個結果意味著，相較於對照組「都是」，「中國人」的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比較低，而「台灣人」的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會比較高，這點符合既有的理論假設。然而，若是檢視兩個變項的 p-value 則會發現，「台灣人」與「中國人」分別為 0.000 與 0.156，只有「台灣人」的 p-value 小於 0.05 而「中國人」則是超過，亦即只有「台灣人」的估計結果在統計學意義上是顯著的。再來政黨認同的部分，「泛綠」的迴歸係數為 2.0615，是一個正數，「泛藍」的迴歸係數為 -0.7366，則是一個負數。也就是說，這兩種政黨認同和對照組「中間選民」比起來，「泛綠」支持者有著更高的機會具有參戰意願，而「泛藍」支持者有著更低的具備參戰意願可能，這兩點也都符合理論假設。而 p-value 檢定方面，無論「泛綠」或是「泛藍」，其 p-value 皆為 0.000，表示這個估計的結果在統計學上是有顯著性的。

人口特徵的變項方面，性別的迴歸係數為 0.3220，是一個正數，這表示男性比起女性有更高的機會具備參戰意願，這點符合既有的假設，而在其 p-value 為 0.041，



小於 0.05 的情況下，該估計結果是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的。不過除了性別因素以外，其餘的變項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職業等 p-value 皆大於 0.05，因此其估計效果都是不具顯著性、不穩定的。這個結果其實並沒有超越既有理論的討論設想，反而是呼應了過去文獻研究發現這幾個人口屬性的影響不太穩定，也對應了前面章節進行交叉分析的結果，依變項與年齡和教育程度不具備線性關係，而與職業則有沒有任何明顯特別的關聯性。大致上來說，台獨情境的模型所估計出來的數據結果，大多數都符合原先的假設，或至少從文獻與前面的討論中可以獲得合理的解釋，大概唯獨國族認同中「中國人」的估計結果沒有顯著性是比較出乎意料的，這個現象本文會在後面進一步嘗試提供可能的解釋。



表 4-17 宣布台獨時參戰意願之迴歸模型

	coef	std err	P> z
const	-0.7158	0.599	0.232
民主偏好	0.3810	0.102	0.000***
國族認同 (都是=0)			
中國人	-0.5839	0.412	0.156
台灣人	1.2516	0.168	0.000***
政黨認同 (其他與中間選民=0)			
泛綠	2.0615	0.306	0.000***
泛藍	-0.7366	0.186	0.000***
性別 (女性=0)	0.3220	0.157	0.041*
年齡	-0.0818	0.068	0.231
教育程度	-0.0861	0.078	0.267
職業 (高、中級白領=0)	0.0775	0.161	0.631
<hr/> <hr/>			
模型資訊			
No. Observations:		1094	
Pseudo R-squ.:		0.2473	
Log-Likelihood:		-502.86	
LL-Null:		-668.12	
LLR p-value:		8.689e-6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 中國武統入侵時的參戰意願



在依變項的戰爭情境為中國武統入侵而爆發時，其參戰意願的迴歸模型則如表 4-18 所示。根據分析圖表可以發現大致上的該模型的估計出來的數據結果，大部分與「台獨」情境時的結果大同小異。在這個模型中，民主偏好的迴歸係數為 0.4296，同樣是一個大於 0 的正數，且 p-value 為 0.000 也是小於 0.05 的數值。這意味著無論在哪個戰爭情境之下，民主偏好與參戰意願的相關性都會呈現為正相關，且這個估計出來的結果在統計學上是具備顯著性而會是穩定的。因此，這裡可以得出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設，在換了戰爭情境的模型後依舊能夠成立，亦即無論戰爭情境為何，民主偏好越高，確實都會導致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也會越高。

控制變項方面，國族認同的估計結果顯示，「中國人」的迴歸係數為-0.9105，是一個小於 0 的負數，而「台灣人」的迴歸係數則為 0.4296，是一個大於 0 的正數。從該數據來看，意味著相較於對照組「都是」，「中國人」有更低機率具備參戰意願，而「台灣人」則是有更高機率具備參戰意願。這個結果符合了前面對於該模型效果的預期，加上「中國人」與「台灣人」的 p-value 分別為 0.021 與 0.000，因此這個效果的估計是具備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的。而在政黨認同方面，各個政黨類別的變項所估計出來的數據分別為，「泛綠」的迴歸係數為 1.6322，是一個正數，而「泛藍」的迴歸係數則為-0.5440，是一個負數。這個結果說明，比起政黨認同的對照組「中間選民」，「泛綠」支持者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會比較高，而相對地，「泛藍」支持者具備參戰意願的可能性會比較低，這個估計結果也符合預期的效果。而估計結果的穩定性檢定上，「泛綠」與「泛藍」的 p-value 分別為 0.000 與 0.004，數值都小於 0.05，因此也是具有顯著性的。

人口基本變項的估計結果，也出現了和前一個模型類似的情況。首先，就估計結果的穩定性而言，只有性別的數據是有顯著性的，其 p-value 為 0.004，小於 0.05，而其他變項的顯著值都超過這個數值，因而不具備顯著性。而性別的迴歸係數為一個大於 0 的正數，0.4666，其意義為男性比起女性，的確會有更高的機會具備參戰意

願。這幾個「武統」條件下的模型所估計出來的結果，和前面「台獨」的模型一樣，大部分的數據都有符合針對模型設計的預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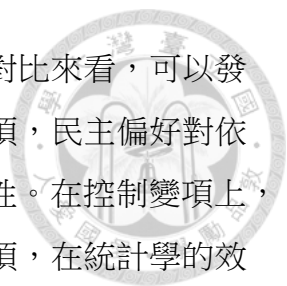




表 4-18 中國武統時參戰意願之迴歸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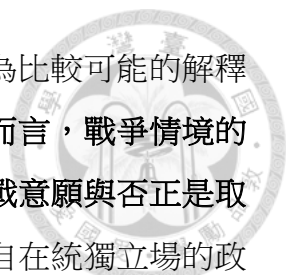
	coef	std err	P> z
const	-0.6509	0.637	0.307
民主偏好	0.4296	0.107	0.000***
國族認同 (都是=0)			
中國人	-0.9105	0.393	0.021*
台灣人	1.1007	0.190	0.000***
政黨認同 (其他與中間選民=0)			
泛綠	1.6322	0.335	0.000***
泛藍	-0.5440	0.191	0.004**
性別 (女性=0)	0.4966	0.170	0.004**
年齡	-0.0427	0.074	0.562
教育程度	-0.0298	0.083	0.721
職業 (高、中級白領=0)	0.2335	0.174	0.179
<hr/> <hr/>			
模型資訊			
No. Observations:		1104	
Pseudo R-squ.:		0.1939	
Log-Likelihood:		-447.76	
LL-Null:		-555.48	
LLR p-value:		1.895e-4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分析完兩個不同戰爭情境的模型後，二者的估計結果綜合對比來看，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哪一種情境底下，本文核心假設所要測量的主要自變項，民主偏好對依變項的效果都是呈現正相關，同時也都具備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在控制變項上，則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大多數被納入模型當中一同分析的變項，在統計學的效果與估計穩定性方面，在兩種情境底下的結果都是相似的，如政黨認同和數個人口幾本變項等；另一種出現比較明確的差異，則是前面針對國族認同當中，「中國人」身份類別效果所作的估計，其顯著性的假設檢定分別在「台獨」和「武統」的模型中，出現了不一樣的結果。當戰爭的發生情境為台灣「宣布獨立」時，「中國人」變項的 p -value 會大於 0.05，因此不具備顯著性，然而當戰爭情境換成是中國「武力統一」而侵台時，此時「中國人」變項中的 p -value 則會小於 0.05，也就具備顯著性，這前後數值不一的現象，是本文中少見的因戰爭情境不同而導致估計的數據有著明顯的差異。


若要解釋這個差異，得先就國族認同估計結果的意義來看，在該題組中「都是」被設為對照組的條件下，「中國人」與「台灣人」變項的作用實際上是以具備雙重身份認同的人當作參照對象，來個別估計單一身份認同者的效果，而其數據結果也就會是純粹的「中國人」或純粹的「台灣人」與「都是」者之間的差別。也因此，當「中國人」和「台灣人」在兩種情境的模型中，都估計出「中國人」的迴歸係數是正數而「台灣人」的迴歸係數則是負數時，僅就變項間的正負向關係而言，這個得出的結果只意味著，在該模型中比起「都是」，呈現出「台灣人」較有可能有參戰意願，而「中國人」較沒有可能有參戰意願，姑且還和估計結果的穩定性無關。而當論及假設檢定時，「中國人」變項在「台獨」模型中不具備顯著性，則意味著以本資料所跑出來的模型結果，有著大於 5%的機率可能會出現迴歸係數正負向完全相反的結果，因此就統計學意義上來說，該估計結果是不太穩定的。關鍵就在於「都是」作為對照組，當「中國人」變項的估計數據不太穩定時，這可能意味著，在「台獨」的情境下，「中國人」和「都是」對比起來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至少是達統計學意義的明顯程度，使得「中國人」變項本身的效果是足夠強烈的。相對地，「中國人」變項在「武統」情境時，和「都是」之間的差異化程度就足夠明顯。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資料結構上會有情境差異的情況，本文認為比較可能的解釋是，對不少在國族認同的題組回答上選擇「都是」的雙重認同者而言，戰爭情境的差異意味著「戰爭責任」是否歸屬於台灣自己一方，而其具備參戰意願與否正是取決於此。這背後依據的理由主要是因為不同的國族認同類別，各自在統獨立場的政治光譜中其主要偏向的位置也可能會不一樣。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者自然偏向獨立，而「中國人」則會偏向統一，「都是」則居於中間。換句話說，對於「台獨」的接受程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與具備兩種認同的族群本來就小於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族群的情況下，當戰端是由於台灣宣布獨立而造成之時，可能會讓不少雙重認同者認為應該要歸咎於台灣自己事先挑釁，進而導致具備意願上戰場的人會比較少，而其結果就會造成與自我認同為「中國人」者之間形成的差異不夠大，影響到後續的估計效果。反之若是當戰爭情境轉變，變成中國為了統一而對台灣動武時，此時的處境等同於台灣要被迫迎戰，「戰爭責任」也就不會有被歸咎於台灣自己的嫌疑。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可能就會有明顯更多的雙重認同者是具備參戰意願的，而相較「中國人」認同者有意願作戰的人增幅不多的條件下，這兩種國族認同類組之間的差異性就會被拉開，使得「中國人」變項的估計效果也會變得更顯著。

而這個解釋方式其實也能套用在，解釋為何「台灣人」變項的估計結果在兩種模型中都一樣具備顯著性這點上。根據其理由，這是因為「台灣人」認同者本身對於台灣「宣布獨立」這件事的接受度就比較高，所以即使當兩岸之間的戰事是由於「台獨」的原因而爆發時，並不會影響到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人的參戰意願，這也就導致了在模型的估計結果上，無論是哪一種情境底下，「台灣人」變項的 *p-value* 都是具有顯著性的。就「台灣人」變項結果的解釋也能適用的這點而言，也能多少作為側面支持該解釋方式具備有效、可行性的論據。

第三節 模型共線性診斷



為了進一步評估確保本次模型設定的品質，以避免在本文的模型中所有被納入進行估計的自變項之間，因出現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問題而導致模型的估計結果產生偏誤，因此本節會對所有納進模型分析的自變項進行共線性診斷。共線性的診斷方式，本文採用的是學界通常使用的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簡稱 **VIF**）作為衡量模型中的自變數間有無存在共線性的判斷依據。而根據學界常用的判斷標準，模型中自變數換算的 **VIF** 值若是大於 10 或 5，則就意味著有出現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雖然本文的模型因為不同的戰爭情境，而分別針對各自的依變項進行估計，不過由於兩個模型中所納入分析的自變項都相同，因此換算過的 **VIF** 值結果會是一致的，如表 4-19 所示。根據各個自變項的求得的結果，可以發現除了常數項的 **VIF** 值遠遠大過於 10 或 5 之外，其餘的自變項，包含民主偏好、控制變項如國族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基本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當中沒有一個的 **VIF** 值超過 2，顯示本文所設定的模型並沒有出現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 4-19 變異數膨脹因子分析



	VIF
const	61.5726567969545
民主偏好	1.05765699383305
國族認同 (都是=0)	
中國人	1.07091945768445
台灣人	1.34345608721615
政黨認同 (其他與中間選民=0)	
泛綠	1.25547586640988
泛藍	1.17273939488579
性別 (女性=0)	1.01931853767521
年齡	1.48172982798929
教育程度	1.46369080506388
非高、中級白領	1.083331834037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試圖解釋人們對於民主制度的偏好是否會提升人們在面對戰爭威脅時，上戰場保衛家園的意願。這項研究的發想固然是基於台灣近年政治的實物情況，以及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爆發後的局勢發展，對於弱小且備受威脅的民主國家是否具備抵抗意志的疑問。而民主作為當代與威權政體最顯著的公共生活模式之差異，它的重要性能否跳脫學堂的高深辯論而為即使是尋常市井小民接受並支持，乃至於為了維護這項政治制度甘冒生命代價，則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本文以什麼樣的因子會影響人們做出願意參與戰爭，這種乍看之下都絕對百害無一利的行徑，作為核心的途徑來切入這個題旨的探討。當中試圖將制度偏好這種並無物質利益的考量從一般的工具理性算計中抽離出來分析，所以選擇了國族情感與價值等文化理論架構作為可以對話並盡可能提供解釋的方式，而這也呼應了 Norris 等人在烏俄戰爭爆發後，針對烏克蘭人參戰意願所做的初步分析。


從民主偏好和參戰意願的模型估計結果來看，民主偏好與依變項參戰意願彼此之間確實出現了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意味著就本文的研究脈絡而言，台灣人對於民主制度出於內在地正面偏好，確實會影響其具備更高的意願在台海一旦戰爭爆發時，參與作戰保家衛國。這個研究發現也揭示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和「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兩個口號之間，有著共通的「民主—國防」論據基礎。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當中亦表明，在台灣政治生態中固有的社會分歧同樣也會對人們的參戰意願有所影響，其主要的因素分別有三：「國族認同」、「政黨認同」以及「戰爭情境」。在本文的模型中「國族認同」與「政黨認同」是作為重要的控制變項被納入分析，其估計結果中確實發現不同類別的「國族認同」與「政黨認同」，對於是否具備比較高的參戰意願也同樣會出現差異。而大致上而言，對於中國越有可能採取比較敵對的立場，相對而言就會具備比較高的參戰意願，這意味著這樣的

實證結果呼應了台灣政治發展一貫會出現的實際情勢和過去針對台灣政治研究的學術成果，「中國因素」始終是台灣政治無法完全抹去的重要問題。

另一方面，「戰爭情境」的差異會對於各個自變項的效果都帶來了些許的影響，雖然與大致結果並沒有明顯的出入。比較小的影響反應在本文前面章節的交叉分析中，當戰爭情境由「台獨」換成「武統」時，在幾個重要的自變項回答中，如民主偏好、政黨認同和國族認同，各個答項組別表達「願意」參戰的比例都有些許提升；比較明顯的影響則出現在當戰爭情境同樣轉變時，「國族認同」中「中國人」與「都是」在參戰意願的效果出現差異。而這些結果本文推測或許和眼下多數台灣人關於國家命運走向的「統獨」立場分佈息息相關。因為「維持現狀」是多數台灣人在統獨光譜中的「最大公約數」，這也意味著雖然統派是少數，但真正偏向積極爭取台灣（法理）獨立的人也並非多數。如此一來，一旦戰爭的導火線不在台灣一方時，台灣越不是因為主動挑釁中國，越能夠激起跨黨派、立場的多數人對於「抗中保台」的共鳴，進而提升了各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在參與作戰這件事情上的意願。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雖然目前本文在模型所估計出來的結果，就統計學的意義而言支持了本文的假設，說明了對民主制度的支持會影響人們的參戰意願。但同時也不可否認在本文的研究中，依然有許多未竟之處，受限於資料結構或是脈絡因素，無法盡善盡美。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屬於單一國研究，因此在推論的效度方面，僅只適合用於台灣的案例解釋上。就研究的脈絡而言，民主偏好和參戰意願有正相關此一論點，可能就不見得能夠在其他國家的案例中得到一樣證成的結果。這部分有賴於後續能夠運用其他更大型的跨國資料庫來進行研究來補足，不過跨國的大型民意調查計畫，在其調查方法的設計上是否能夠兼顧不同國家個案的特殊社會脈絡，可能也會有其他一樣會對參戰意願造成影響的特別因素存在，這也是相當重要的考量。



再者由於本文的研究所取用的資料實際上為單一年期，因此另一項研究限制即為無法充分觀察與分析不同年度的實證結果是否會與本文呈現一致。這背後固然涉及到除了前述納入本文模型中所考量到可能會對依變項造成影響的因素外，不同的年度本身是否也有專屬於當年度的特殊因素可能影響參戰意願。如 2020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結果，普遍被視為受到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影響，而這也許也會一併影響到當年度所做的參戰意願調查結果。這些問題的分析就得有待後續針對參戰意願，進行跨時度的縱貫性研究來解決。而本文考量到推論模型的精簡性，以及受限於既有的資料結構可能也不見得能夠很好地量測不同年度間的脈絡因素，因此暫以分析單一年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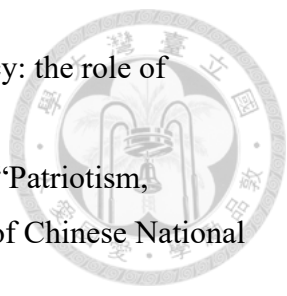
最後，台灣人的參戰意願其實還受到非本文分析架構以及不在調查資料所搜集範圍內的其他因素影響，如台灣人對於國防整體的信心、軍事訓練的評價、戰爭經驗的有無，以及美國是否介入台海軍事衝突等問題，同樣在一些研究中被發現也會對台灣人的參戰意願造成影響（陳方隅、王宏恩、吳冠昇、葉耀元，2022），然而基於本文研究主旨的切題性和原始問卷的設計，這些問題沒有辦法被納入本文當中討論。



參考文獻



- 林夏如，2019，《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台北：商周出版。
- 若林正文，2016，《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18 (1): 1-34。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臺灣民主季刊》，8 (2): 99-137。
- 張佑宗、朱雲漢，2013，〈威權韌性與民主赤字：21世紀初葉民主化研究的趨勢與前瞻〉，蕭高彥、吳玉山〈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台北：五南，121-150。
- 陳方隅、王宏恩、吳冠昇、葉耀元，2022，〈安全研究的個體化：個人當兵經驗如何影響臺灣防衛決心〉，《問題與研究》，61 (3): 145-172。
- 陳陸輝，2019，〈台灣的民主治理與政治支持〉，《東亞研究》，50 (1): 119-152。
- 湯晏甄，2013，〈「兩岸關係因素」真的影響了2012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嗎？〉，《臺灣民主季刊》，10 (3): 91-130。
- Achen, C. H. and T. Y. Wang. 2017. *The Taiwan Vot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žāns, M. and Andris Sprūds. 2020. "Three-Decade Evolution of the Willingness to Defend One's Own Country: the Case of the Baltic States." *Lithuanian Annual Strategic Review* 18 (1): 1-26.
- Chang, Y. and Yun-han Chu. 2011. "Procedural quality only? Taiwanese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 (5): 598 – 619.
- Cheng, T. 1988.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 (4): 471-499.
- Elder, G. H., Cynthia Gimbel, and Rachel Ivie. 1991. "Turning Points in Life: The Case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War." *Military Psychology* 3 (4): 215-231.

- 
- Gibler, D. M., and Jamil A. Sewell. 2006. "External threat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NATO revisite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413-431.
- Gries, P. H., Qingmin Zhang, Michael Crowson and Huajian Cai. 2011.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hina's US Policy: Structur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5: 1–17.
- Holland, E. 2017. "Ukraine and Taiwan: Small Powers in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 Rivalries." *World Policy Journal* 3 (1), 107-118.
- Inglehart, R. and Bi Puranen. 2015. "Declining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one's country: The individual-level basis of the long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2 (4): 418-434.
- Kuzio, T. 2013. "Compe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The Fifth and Sixth Cycles in Post-Soviet Ukrainian History." *Acta Slavica Iaponica* 33, 27-46.
- Lynch, D. 2022.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 *Pacific Affairs* 75 (4): 557-574.
- Lutz, A. 2008. "Who Joins the Military?: A Look at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Statu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36 (2): 167-188.
- Molchanov, M. 2002.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S. 2016. "Democracy and national destinies on Taiw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4): 666 – 685.
- Puranen, B. 2014. "Allegiance eroding: People's dwindling willingness to fight in wars." In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 ed. Russell J.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1-281.
- Sears, D. and Carolyn L. Funk. 1991.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 1-91.
- Sears, D., Richard R. Lau, Tom R. Tyler and Harris M. Allen, Jr. 1980. "Self-Interest vs. Symbolic Politics in Policy Attitudes and Presidential Vot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3): 670-684.
- Sapountzis, A. 2008. "Towards a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National Sentiment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Revisited."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 (1): 34–50.

- 
- Skitka, L. J. 2005. "Patriotism or Nationalism? Understanding Post-September 11, 2001, Flag-Display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 (10): 1995-2011.
- Torgler, B. 2003. "Why do people go to war?"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14 (4): 261-280.
- Wu, Y. S. 2017. "Pivot, Hedger, or Partner: Strategies of Lesser Powers Caught between Hegemons." In *Taiwan and China*, ed. Lowell Ditt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20.
- Yeh, Y. Y. and Charles K. S. Wu. 2021. "When War Hits Home: Taiwanese Public Support for War of Neces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1 (2): 265-293.
- WIN/Gallup International. 2015. "WIN/Gallup International's Global Survey Shows Three in Five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ir Country." in <https://www.gallup-international.bg/en/33483/win-gallup-internationals-global-survey-shows-three-in-five-willing-to-fight-for-their-country/>. Latest update 12 September 2022.
- Vorobiov, M. 2022. "Putin's Invasion of Ukraine Decimates Influence of Local Pro-Russian Parties." I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putins-invasion-of-ukraine-decimates-influence-of-local-pro-russian-parties/>. Latest update 26 September 2022.
- Reed, J., Guy Chazan and Roman Olearchyk. 2022. "The birth of a new Ukraine: how Russia's war united a nation." in <https://www.ft.com/content/9ab50dee-67f5-4e1b-8456-d8f11814ef18>. Latest update 26 September 2022.
- Sociological Group "Rating". 2022. "Seventeenth National Survey: Identity. Patriotism. Values (August 17-18, 2022)." in https://ratinggroup.ua/en/research/ukraine/s_mnadcyste_zagalnonac_onalne_opituvannya_dentichn_st_patr_otizm_c_most_17-18_serpnja_2022.html. Latest update 26 September 2022.
- Norris P. and Kseniya Kizlova. 2022. "What mobilises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in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22/03/03/what-mobilises-the-ukrainian-resistance/>. Latest update 26 September 2022.